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第30期（民國87年12月）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郭沫若與〈甲申三百年祭〉

潘 光 哲

摘 要

郭沫若於1944年發表〈甲申三百年祭〉（以下簡稱〈甲申〉），引發了一連串的風波。本文以個案取向處理環繞著〈甲申〉的相關歷史情勢，盡可能地避免意識形態的糾結，從比較寬廣的脈絡（政治的、學術的〔包括廣義的學術史與史學史〕、思想的）來詮解它的問世及效應。

本文首先探討〈甲申〉問世的政治脈絡，分別就「郭沫若與中共戰時的文化統戰」、「中共戰時的『反中國法西斯』鬥爭」兩個主題進行說明。政治脈絡之外，本文重建「郭沫若寫作〈甲申〉的心路旅程」，論述他的創作興趣——特別是對將歷史題材戲劇化的創作興趣——也是此文出現的因素。在分析〈甲申〉的論旨後，並析論〈甲申〉的現實迴響，批判者、唱和者，各皆有之，甚亦產生讓中共領導階層用以達成「整風」的政治用途。最後，從學術史業績的角度、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發展的脈絡以及思想史的脈絡，分別進行評估，指出〈甲申〉的重要性，並不是由於它在這些方面有什麼樣的獨創性或先驅作用，而是政治現實烘托而成的。

本文嘗試以比較細緻的個案探討方式，進行疏理與解析。以〈甲申〉為例，正可顯示歷史論述與政治現實的互動關聯相當複雜，有待後世的史學工作者細心疏理的問題空間，實是無限寬廣。

關鍵詞：郭沫若　〈甲申三百年祭〉　「整風」運動　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第30期（民國87年12月）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Kuo Mo-jo and "Chia-shen San-pai-nien-chi"(Commemoration of the 300th Anniversary of Chia-shen Year)

Pan Kwang-che

Abstract

Kuo Mo-jo was a famous leftist intellectual and pioneering Chinese Marxist historian, and his "Chia-shen San-pai-nien-chi"(Commemoration of the 300th Anniversary of Chia-shen Year) written in 1944, represented one of the conflicts in the cultural sphere between the Nationalist and the Communists during the 1940s.

In this paper, the author first tried to show the political context of "Chia-shen" and the reasons why Kuo wrote it, and then describe the positive and negative responses it generated. Treating "Chia-shen" especially as a historical discourse, an attempt was made to explain how it was transformed to become one of the ideological weapons for the "cheng-feng" movement(the Rectification movement) by Mao, the leader of the CCP. Finally, the author evaluates the academic value and the intellectual context of "Chia-shen".

The author puts forward the view that, by using "Chia-shen" as a case study, we can find that as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historical discourse and political reality is complex, historians have to be careful in dealing with their relationships.

Key Words: Kuo Mo-jo, "Chia-shen San-pai-nien-chi"(Commemoration of the 300th Anniversary of Chia-shen Year), the "cheng-feng" movement(the Rectification movement), Chinese Marxist Historiography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第30期（民國87年12月）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郭沫若與〈甲申三百年祭〉*

潘光哲**

一、導論
二、〈甲申〉問世的政治脈絡
三、郭沫若寫作〈甲申〉的心路旅程
四、〈甲申〉的論旨
五、〈甲申〉的現實迴響
六、結論：評價與反思

* 引書簡寫如下：(1)《全集》歷史編：《郭沫若全集》歷史編（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1985）；(2)《全集》文學編：《郭沫若全集》文學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1992）；(3)《佚文集》：王錦厚（等編），《郭沫若佚文集(1906-1949)》2冊（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1988）；(4)《書信集》：黃淳浩（編），《郭沫若書信集》2冊（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5)《專集》：《郭沫若專集》2冊（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6)《資料》：王訓昭（等編），《郭沫若研究資料》3冊（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6）；(7)《王譜》：王繼權、童煒鋼，《郭沫若年譜》2冊（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83）；(8)《龔譜》：龔濟民、方仁念，《郭沫若年譜》3冊（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9)《整風學習》：延安中央黨校整風運動編寫組（編），《延安中央黨校的整風學習》，集1（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8）、集2（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9）。又，《郭沫若全集》歷史編共8冊、《郭沫若全集》文學編共20冊，引用時除註明文章篇名外，簡寫如下：「文章篇名，冊數：頁數」，例：〈釣魚城訪古〉，《全集》歷史編，3:352-381，即指引自《郭沫若全集》歷史編，冊3，頁352-381；又如：《南冠草》，《全集》文學編，7:305-412，即指引自《郭沫若全集》文學編，冊7，頁305-412。

** 台灣大學歷史學系博士候選人，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約聘研究助理；本文陸續承蒙閻沁恆、張忠棟、陳永發、張瑞德、翟志成、沈松僑、王汎森諸教授教正，學友金仕起先生並校讀初稿一過，謹此深致謝忱。

一、導　論

民國 33 年（1944 年），歲次甲申，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以下簡稱〈甲申〉），[1] 自 3 月 19 日起於重慶《新華日報》連載。結果，這篇文章不僅成爲戰時國共鬥爭（特別是文化鬥爭）之一幕，也被中共領導人轉化爲進行「整風」、形塑意識形態的工具，清楚地呈顯歷史與現實的互動關係。至今，〈甲申〉仍不能突破它爲現實服務的色彩，[2] 所以，中國大陸學界對環繞著〈甲申〉相關歷史情勢的理解，多糾纏於意識形態，出以吹捧溢美之辭，並不能滿足我們的知識要求。[3] 政治意義（和作用）之外，〈甲申〉也有著學術史和思想史意義。它和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主題之一：中國「農民戰爭史」[4] 研究有相當的關聯，但它在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史的地位卻需

---

1 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原刊：重慶《新華日報》（1944 年 3 月 19-22 日；未見），又刊於：《解放日報》（1944 年 4 月 18-19 日），收入：氏著，《歷史人物》（上海：海燕書店，1948），頁 91-117，又收入：《全集》歷史編，4:176-204；〈甲申〉版本眾多（參見：《資料》，下冊，頁 201-203），本文引用時悉依《歷史人物》一書爲準，徵引文字有出入者，加[　]表示爲《全集》歷史編之文字。

2 當前中共領導人依舊從政治作用的層面闡釋〈甲申〉，如江澤民即說：「早在進城以前，毛澤東同志就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向全黨提出"兩個務必"，告誡我們警惕用糖衣裹著的炮彈的襲擊。郭沫若寫的〈甲申三百年祭〉，也是總結李闖王的教訓。……」。因之，中央文獻出版社再度推出〈甲申〉，「推薦給肩負重任的高中級幹部，希望它有助於提高全黨對"執政黨的黨風問題是有關黨的生死存亡的問題"這一命題的認識……」（以上所述，均參見：楊瑞廣[執筆]，〈編者的話〉，頁 4-5，收入：楊瑞廣[編]，《歷史的啓示──重印〈甲申三百年祭〉》[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1]）。

3 如王錦厚著眼於戰時「國統區」、「淪陷區」的文人爲了找出宣揚「法西斯主義理論的歷史根據」而熱衷研究明季歷史的狀況，認爲〈甲申〉應運而生，是批判法西斯理論的重要組成部份（王錦厚，〈關於《甲申三百年祭》的風波──駁〈評《甲申三百年祭》〉〉，收入：氏著，《郭沫若學術論辯》[成都：成都出版社，1990]，頁 93-142）。可是，只強調〈甲申〉的現實意義，並以意識形態爲標準「褒揚」其文其人的觀點，並無助於理解環繞著〈甲申〉的相關歷史情勢；日本學界方面，如：石井明，〈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の再刊〉，亦認爲郭沫若撰寫〈甲申〉的動機出於政治（文刊：《龍溪》，號 3[1972 年]，未見，參見：佐藤文俊，《明末農民反亂の研究》[東京：研文，1985]，頁 286-287）。

4 「農民戰爭史」是 1949 年後中國大陸史學界的重大課題，一度被認爲是「史學界的五朵（金）花」之一（逯耀東，《中共史學的發展與演變》[台北：時報文化出版事業有限公司，1979]，頁 4、8、57），討論熾烈，總結 1949 年到 1989 年間研討成果之作也

要審慎的評估；[5] 而選擇以明季（流寇）史事爲探討主題的〈甲申〉（與相關文獻）之問世，還有著思想史淵源，具有賡續晚清以降研討明季（與南明）史事、刊佈明季史著等行動的意義。[6] 總之，〈甲申〉涉及的課題相當廣泛，值得細緻分析。

本文以個案取向處理環繞著〈甲申〉的相關歷史情勢，從比較寬廣的脈絡來理解它的問世及效應。筆者的論述策略是：探討〈甲申〉問世的政治脈絡，重建郭沫若寫作的心態和過程，釋論它在那樣的時空背景下的政治作用，嘗試解析它的史學史與思想史意義。筆者希望能跳脫意識形態的糾結，讓我們能更多面向地認識與〈甲申〉相關的歷史問題。[7]

很多，如：蘇雙碧，〈中國農民戰爭史〉，收入：蕭黎（主編），《中國歷史學四十年》（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 1989 ），頁 373-391 ，不詳舉；台灣學界的討論，可參見：吳安家，〈中共對中國歷史上農民起義的政治解釋〉，收入：氏著，《中共史學批判論集》（台北：幼獅文化事業公司， 1979 ），頁 49-113 ；英文專著如： J. P. Harrison, *The Communists and Chinese Peasant Rebellions: A Study in the Rewriting of Chinese History* (London: Victor Gollancz Ltd., 1970)，對中國大陸學界的「農民戰爭史」成果之論列頗爲精到，不過作者忽略了「農民戰爭史」研究的歷史縱深角度與另一層面的現實作用。如他認爲郭氏論著主調是探討「帝王將相」，〈甲申〉爲其論著主調之異例(pp. 90-91)，然即如本文所述，〈甲申〉被列爲學習的「整風」文件，有現實作用；其他文獻，如劉廣京論釋毛逝後「農民戰爭史」研究之意義的變化(Kwang-ching Liu, "Worldview and Peasant Rebellion: Reflections on Post-Mao Historiography,"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40:2 [Feb. 1981], pp. 295-326)，亦甚發深蘊；日本學界對明末「農民戰爭史」爲主的成果檢討，參見：佐藤文俊，《明末農民反亂の研究》，頁 261-269 ，不詳論。

5 中國大陸學界都推崇〈甲申〉對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與「農民戰爭史」研究的「貢獻」，如桂遵義強調它是「對馬克思主義史學農民戰爭史研究的新開拓」（桂遵義，《馬克思主義史學在中國》[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 1992]，頁 438-440 ）；但他們卻只就傳統史學或當時的非馬克思主義史家之否定、抹殺「農民起義」的論述，與郭的「稱揚」對比，便加以稱頌之辭。筆者認爲，必須從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發展脈絡中，將〈甲申〉與當時（及此後）的馬克思主義論者對此一課題的既有觀點進行對比，才能明確闡明它在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史的座標地位，否則將無法避免片面論證觀點的缺失。

6 關於清末研討明季（與南明）史事、刊佈明季史著的歷史／政治意義之整體討論，參見：王汎森，〈歷史記憶與歷史：以中國近世史事爲例〉，《當代》，期 91 （ 1993 年 11 月），頁 40-49 。

7 亦可免除中國大陸學界以吹捧溢美之辭爲〈甲申〉進行定位的弊失。筆者認爲，研析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發展，並就中國現代思想史／史學史的脈絡進行評估，應該就個案（如馬克思主義史家之生平、著作內容、馬克思主義史學中的若干爭議課題等），進行

二、〈甲申〉問世的政治脈絡

郭沫若的〈甲申〉主要是透過對明末流寇——他以「農民運動」稱之——的歷史進行概括論述，以之爲例證，提出若干可供反省參照的觀點，儼然有著自歷史汲取智慧，總結歷史教訓之意味。唯衡諸實景，〈甲申〉基本上並不是身爲文化人的郭沫若主動自發地進行學術研究的成果，而是與當時的政治環境有緊密關聯的產物。據柳亞子所述，發動、組織的大致情形是這樣的：[8]

> 今年[一九四四年——引者]一月三十一日收到于懷兄[9]同月十六日從渝都發出的一封信，說道：「今年適値明亡三百年，我們打算紀念一下，沫若先生們都打算寫文章。昨天在郭[沫若]先生家和一些朋友閒談，大家都一致認爲你[指柳亞子——引者]是南明史泰斗，紀念明亡，非你開炮不可。」

但柳亞子因病謝絕。[10]從這條史料提供的線索，配合中共唯一在重慶公開發行的機關刊物《群眾》[11]日後推出「紀念甲申三百年」專題的情勢，[12]以及

微觀而多元的探究，方有助益，參見：潘光哲，〈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研究成果的省思與回顧——以中、英文資料爲主〉，《大陸雜誌》，卷94期2、3（1997年2、3月）。

8 柳亞子，〈紀念三百年前的甲申〉，《群眾》，卷9期7（1944年4月15日），頁282-283，又收入：《柳亞子選集》，上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頁479-484。按，柳亞子此文繫年爲1944年3月22日，《柳亞子選集》誤爲1943年3月22日。

9 侯外廬在自傳中說于懷爲喬冠華，1942年時是《新華日報》的國際版負責人（侯外廬，《韌的追求》[北京：三聯書店，1985]，頁133）；喬冠華在1943年後又是《新華日報》社論委員會成員之一（張友漁，〈我和《新華日報》〉，收入：石西民、范劍涯[編]，《《新華日報》的回憶・續集》[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頁76-77）；至於喬冠華當時（特別是在中共黨內）的具體職務爲何，史料有闕，難能判斷。

10 柳亞子，〈紀念三百年前的甲申〉，《群眾》，卷9期7，頁282；不過柳亞子自述，最後他還是因病勢稍減，故仍然撰寫此文。

11 許滌新，〈《群眾》史話〉，收入：《《新華日報》的回憶》（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頁99-107。

12 《群眾》卷9期7的「紀念甲申三百年」專題刊佈了4篇文章：柳亞子，〈紀念三百年前的甲申〉、喬辛，〈桃花扇底看南朝〉、魯西良，〈明末的政治風氣〉、寓曙，〈明末清初史學底時代意義〉；喬辛即翦伯贊（因〈桃花扇底看南朝〉此文收入他的《中國史論集》，輯2[上海：國際文化服務社，1947]，頁253-273，又收入：《翦伯贊史學

當時的整體政治脈絡來看，〈甲申〉這篇文章應當是國共鬥爭場景下因應中共方面需要的產物。與中共有深厚關係的郭沫若，再一次搖動著他的筆桿，拿出了「鬥爭的武器」。

（一）郭沫若與中共戰時的文化統戰

郭沫若早在 1927 年 8 月 17 日就經周恩來與李一氓介紹加入中共，此後流亡日本，也是透過中共的安排。至中日戰爭軍興，郭沫若方始返回中國，一回到上海，就恢復了中共黨籍，然而卻是「不過黨的小組生活，不和任何地方黨委發生關係」，只受中共中央長江局（後改稱南方局）周恩來等少數負責人直線連繫的「特別黨員」，在社會上則以無黨派人士的身份活動。[13]

戰時的郭沫若和中共的關係相當密切。公職方面，郭沫若於 1938 年出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第三廳廳長、後來於 1940 年擔任文化工作委員會主任等職務，都出自於中共——尤其是周恩來——的安排；[14] 生活上，他也得到中共的照拂，如考慮到郭沫若著作之出版及家庭經濟困難的問題，幫助他的第三任妻子于立群及侄子郭培謙在重慶成立群益出版社，專門出版郭的著作。[15] 1941 年 11 月 16 日是郭沫若的 50 歲生日，也是他創作生活的 25 週

論文選集》，輯 1[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0]，頁 217-235），至於魯西良與寓曙爲誰，不得而詳。

13 吳奚如，〈郭沫若同志和黨的關係〉，《專集》，冊 1，頁 314-315；郭沫若早在 1926 年擔任廣東大學（即中山大學）文科學長後就申請加入中共，但未被批准（宋彬玉，〈大革命時期郭沫若同黨的關係〉，《郭沫若研究》，輯 4[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 1988]，頁 223-226）。

14 參見：周恩來，〈速將宣傳綱領擬好——致郭沫若（1938 年 2 月 24 日）〉，收入：《周恩來書信選集》（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 1988），頁 142-143、周恩來，〈文藝和對敵工作仍能有所貢獻——致郭沫若（1940 年 9 月 8 日）〉，《周恩來書信選集》，頁 184-185；這 2 封信是周恩來安排郭沫若擔任這兩項職務最直接的史料，不再徵引一般言及此 2 事的其他資料。

15 吉少甫，〈回憶郭老和群益出版社〉，《文藝論叢》， 1980 年輯 10，未見，轉引自：龔濟民、方仁念，《郭沫若傳》（北京：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 1988），頁 307；陽翰笙又說由他與馮乃超主持此一工作，「以個人名義進行投資」（陽翰笙，《風雨五十年》[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 1986]，頁 288）；群益出版社在 1942 年 8 月 13 日成立，開始營業（陽翰笙，《風雨五十年》，頁 289、《龔譜》，中冊，頁 525）。

年，經周恩來倡議與積極推動，[16] 重慶、延安、香港等地，都舉辦了紀念活動；[17] 當天重慶《新華日報》還在頭版刊出周恩來的〈我要說的話〉，說「魯迅是新文化運動的導師，郭沫若便是新文化運動的主將」，高度揄揚郭的地位。[18] 凡此可見，中共為了實現「以郭沫若同志為魯迅的繼承者，中國革命文化界的領袖」這個黨內決議，[19] 委實花了不少力氣。

當然，中共當局對郭沫若的「照顧」，是有其作用的。以主辦郭沫若 50 歲生日及創作 25 週年的紀念活動而論，就是中共為適應當時鬥爭需要所採取的一種活動形式，中共南方局於 1942 年向中央的報告說：[20]

> 由於當局之種種壓迫，過去文化活動的方式已不能用，被迫產生新的方式。借文化人的紅白日，郭沫若氏之五十壽辰，馮玉祥之六十壽辰，張沖之追悼會等等，以此方式進行一些文化活動。

在個別場合中，郭沫若也幫助了中共統戰工作的進行。如他曾介紹《新民報》的工作人員認識周恩來， 1942 年秋還陪伴周恩來與《新民報》編採負責人見面談話，周在席間亦曾與小說家張恨水會談；[21] 為回應國府查禁書刊、

---

16 陽翰笙，《風雨五十年》，頁 285 。

17 關於這次活動情況的籌備情形，參見：陽翰笙，《風雨五十年》，頁 285-286 ；關於重慶活動情況的報導，參見：楊賡，〈詩筆燦爛的二十五年〉，收入：中共重慶市委黨史工作委員會（編），《南方局領導下的重慶抗戰文藝運動》（重慶：重慶出版社， 1989 ），頁 482-484 ；費正清亦有參與此次活動之回憶(J. K. Fairbank, *Chinabound: A Fifty-Year Memoir* [New York: Harper & Row Publishers, 1982], pp. 261-262)；關於各地舉辦這次活動的情況，參見：《龔譜》，中冊，頁 481-484 、《王譜》，頁 419-421 。

18 周恩來，〈我要說的話〉，《南方局領導下的重慶抗戰文藝運動》，頁 476-481 。

19 吳奚如，〈郭沫若同志和黨的關係〉，《專集》，冊 1 ，頁 316 。

20 〈南方局關於文化運動工作向中央的報告（ 1942 年）〉，收入：南方局黨史資料編輯小組（編），《南方局黨史資料・文化工作》（重慶：重慶出版社， 1990 ），頁 13 ；陽翰笙回憶，周恩來在提議舉辦這次活動時對郭沫若說：「為你作壽是一場意義重大的政治鬥爭；為你舉行創作二十五週年紀念又是一場重大的文化鬥爭……」（陽翰笙，《風雨五十年》，頁 285 ）。

21 陳銘德、鄧季惺，〈周恩來在重慶與我們的幾次見面（摘要）〉，《南方局黨史資料・統一戰線工作》，頁 296-297 ，參見：金沖及（主編），《周恩來傳》（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 1989 ），頁 521-522 ；後來《新華日報》刊有祝賀張恨水創作 30 年紀念的祝詞（〈張恨水先生創作三十年（短評）〉，原刊：《新華日報》[1944 年

劇本的行動，郭沫若也曾邀集重慶各劇團負責人、主要編導和書店出版界人士，在他的寓所與周恩來會商共議；[22] 國民參政會通過組織「延安觀察團」訪問延安後，[23] 周恩來亦曾要求郭沫若邀集文化界人士訪問延安，「事雖未必就成，蓋亦可造爲輿論」。[24] 甚至毛澤東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也是透過郭沫若，向重慶「進步文化界人士」傳達的。[25]

此外，郭沫若的歷史劇創作活動，也有利於中共在文化宣傳領域中取得優勢的現實作用。 1940 年代初期是郭沫若創作歷史劇的鼎盛期，從 1941 年底到 1943 年初，他連續創作了 6 部大型的歷史劇：《棠棣之花》、《屈原》、《虎符》、《高漸離》、《孔雀膽》、《南冠草》。[26] 雖然，部份的歷史劇曾得到周恩來具體的意見指導，如周恩來就曾對《棠棣之花》劇本的用字遣

---

5 月 16 日]，《南方局領導下的重慶抗戰文藝運動》，頁 493 ）。

22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1898-1949)》（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 1990 ），頁 558 。

23 國民參政會第 3 屆 14 次大會（ 1944 年 9 月 15 日下午）通過由冷遹、王雲五、胡霖、傅斯年及陶孟和 5 位參政員組織「延安觀察團」（《中央日報》 1944 年 9 月 16 日）；但至 1945 年 7 月 1 日始成行，出席者則爲：黃炎培、褚輔成、章伯鈞、冷遹、傅斯年與左舜生（傅樂成，《傅孟真先生年譜》，收入：《傅斯年全集》[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1980]，冊 7 ，總頁 2650-2651 、王汎森、杜正勝[合編]，《傅斯年文物資料選輯》[台北：傅斯年先生百齡紀念籌備會， 1995]，頁 112 ）。

24 周恩來，〈切盼文化界朋友來延安——致郭沫若（ 1944 年 9 月 17 日）〉，《周恩來書信選集》，頁 248-249 。

25 劉白羽，〈雷電頌——懷念郭沫若同志〉，節錄收入：《專集》，冊 1 ，頁 326-329 ；在劉白羽的回憶中，此事之繫年爲 1944 年春（《襲譜》則將此事繫年爲 1944 年 5 月 27 日[中冊，頁 576]）；惟據張穎回憶，重慶「文藝工作者」在 1943 年年底就讀到了〈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張穎，〈〈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在國統區的傳播與學習（節錄）〉，《南方局領導下的重慶抗戰文藝運動》，頁 445 ；但張穎未說明是否透過郭沫若傳達）；按，毛雖早在 1942 年 5 月做〈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然此文要到 1943 年 10 月 19 日才在《解放日報》發表（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893-1949)》[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 1993]，中卷，頁 378-379 、 476-477 ），翌日中共中央總學委發出「學習」這個講話的通知（〈中央總學委關於學習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通知（ 1943 年 10 月 20 日）〉，中共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冊 12[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 1986]，頁 364 ）。

26 張志勛，《沫若史劇概論》（長春：東北師範大學出版社， 1989 ），頁 60 。

詞，提出數十條意見，請郭沫若斟酌；[27] 郭沫若創作《孔雀膽》時，周恩來也曾提供意見，[28] 但我們不能說這幾部歷史劇的創作必定出自中共領導階層的授意。不過，它們確曾激起迴響，[29] 產生一定的政治作用，即正如中共南方局的報告，由於「其他文化活動方式都遭壓迫，於是文化活動乃集中於當局尚未十分注意的演劇運動，收獲不少」，[30] 郭沫若顯然是促成這收穫的主要耕耘者。他的「努力」也得到中共領導階層的好評與肯定，如毛澤東即曾致函郭沫若表示：「你做了許多十分有益的革命的文化工作」，[31] 頗致嘉勉。

總結而論，郭沫若對戰時中共在文化領域中的「鬥爭」活動，有相當的助益。因此，就雙方的密切關係，也就他對中共的文化宣傳作用來看，他會和一群同樣也與中共關係密切的文化人，以「紀念明亡三百年」為主題，結合、組織起來，[32] 採取不「公開點名」的文字批判方式，「藉古諷今」，理

[27] 周恩來，〈對《棠棣之花》的意見——致郭沫若（1941 年 12 月 15 日）〉，《周恩來書信選集》，頁 205-209。

[28] 參見：《龔譜》，中冊，頁 527。

[29] 《棠棣之花》與《屈原》演出後的迴響，參見：廖永祥、林平蘭，〈郭沫若與《新華日報》《群眾》〉，收入：成都、重慶《新華日報》《群眾》周刊史學會（編），《新華之光——《新華日報》《群眾》周刊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重慶：重慶出版社，1993），頁 170-172。

[30] 〈南方局關於文化運動工作向中央的報告〉，《南方局黨史資料・文化工作》，頁 13-14。

[31] 毛澤東，〈致郭沫若（1944 年 1 月 9 日）〉，《毛澤東書信選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頁 221；此外，毛也曾說過「郭沫若在歷史話劇方面做了很好的工作」（毛澤東，〈致楊紹萱、齊燕銘（1944 年 1 月 9 日）〉，《毛澤東書信選集》，頁 222-223）；此外，童小鵬回憶說，郭沫若於 1942 年創作《屈原》時，周恩來曾至郭的住處表示，「屈原在當時受迫害，才憂愁幽怨作《離騷》；現在我們也受迫害，這個題材好」（童小鵬，《風雨四十年》，部 1[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4]，頁 301）。

[32] 據于立群所述，〈甲申〉脫稿於 1944 年 3 月 10 日，稿成後「經過幾天修改」，即送交董必武「審閱」，「沒有想到，交稿後的第三天，《新華日報》就全文連載了」（于立群，〈難忘的往事〉，《專集》，冊 1，頁 369），〈甲申〉於 3 月 19 日開始連載，故郭沫若送交給董必武之時間應是 3 月 16 日；亦且，〈甲申〉於《新華日報》開始連載的同日，也刊載了宗顧的〈三百年前〉一文，翌日又刊載〈甲申事變——明末的亡國歷史〉一文（參見：王守稼、繆振鵬，〈《甲申三百年祭》及其在現代史學史上的地位〉，《郭沫若研究》，輯 1[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1985 年 8 月]，頁 89-90）；而刊佈在《群眾》第 9 卷第 7 期的「紀念甲申三百年」專題的 4 篇文章，可能的完稿時間都是〈甲

有應然。

（二）中共戰時的「反中國法西斯」鬥爭

從政治的大環境來看，中日戰爭期間，國、共兩黨再度聯合，中共屢屢發表宣言「共赴國難」，還聲言「全國軍民必須一致團結擁護蔣委員長領導抗戰」。[33] 但是，雙方並未停止明爭暗鬥，「摩擦」時起。[34]〈甲申〉即是在又一波的國共言論鬥爭風潮這個脈絡中出現的。一方面，為因應蔣介石在1943年3月3日發表《中國之命運》，[35] 批判中共；[36] 另一方面，也為因應共產國際解散，[37] 國府對中共的言論與軍事攻勢，[38] 激使中共當局擬定了以

申〉刊於《新華日報》之後（除嵇曙之〈明末清初史學底時代意義〉文末未署時間外，其他文章的可能完稿時間，據各文文末所署，分別是：柳亞子，〈紀念三百年前的甲申〉[1944年3月22日]、商辛，〈桃花扇底看南朝〉[3月20日]、魯西良，〈明末的政治風氣〉[3月25日；但此文提到已讀過郭的〈甲申〉]）。因此，從郭將文稿送交董必武「審閱」、〈甲申〉等文章之問世時間來推測，當可推定，即確如于懷信中所言，「今年適值明亡三百年，我們打算紀念一下，沫若先生們都打算寫文章」，是一群文化人經過組織、計劃的行動；況且侯外廬說：「我不了解郭沫若研究甲申成敗的背景」（侯外廬，《韌的追求》，頁150），由他與中共方面的深厚關係態勢推論，他對此事毫無所悉，是則文化人以「紀念明亡三百年」為主題而組織起來撰稿，可能也是秘密集會行動的產物；不過，董必武雖然「審閱」過〈甲申〉，他當時又是中共南方局在重慶的負責人之一（另一負責人周恩來當時在延安），但董是否參與了這一行動的計畫，史料有闕，無從證實。

33 張玉法，《中國現代史》（台北：東華書局，1985[6版]），頁618-620。

34 費正清、費惟愷（主編），劉敬坤（等譯），《劍橋中華民國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下冊，頁753-764。

35 《中國之命運》在1943年3月3日發表（〈先總統蔣公年表〉，頁33，收入：張其昀[主編]，《先總統蔣公全集・附錄》[台北：中國文化大學出版部，1984]）；關於《中國之命運》的撰寫及相關情勢，參見：陶希聖，《潮流與點滴》（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79[再版]），頁201-212，並參見：陳存恭、蘇啓明、劉妮玲（訪問），陳存恭、尹文泉（總整理），《陶希聖先生訪問紀錄》（台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94），頁161-168；承陳存恭教授惠示《陶希聖先生訪問紀錄》，謹致謝忱。

36 蔣介石在《中國之命運》中批評「組織武力、割據地方」的政治勢力是「變相的軍閥和新式的封建」（《先總統蔣公全集》，卷1，頁178-179），即意指中共。

37 共產國際（第三國際）在1943年6月8日發表解散聲明，關於其解散背景與經過，參見：鄭學稼，《第三國際史》（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77），下冊，頁1526-1592。

38 毛澤東在〈質問國民黨〉（1943年7月12日，收入：《毛澤東選集》，卷3[北京：人

「反中國的法西斯」爲批判架構的鬥爭觀點，陸續推出相關的反擊宣傳。

蔣介石發表《中國之命運》後，引起文化學術界人士的不滿，[39] 也激起中共當局的反擊鬥爭。大致從 1943 年 7 月起，中共方面展開了以「反中國的法西斯」爲主旨的各式言論反擊。除了在報刊上發表批判文字，連篇累牘，公然針鋒相對之外，[40] 中共領導當局亦有反擊的明確指示。毛澤東即指示身在重慶的董必武，表示要「在中國人民面前從思想上理論上揭露蔣之封建的買辦的中國法西斯體系」，並囑告他採取各種執行方案，其中之一即是「《新華[日報]》尤其《群眾》可用其他迂迴辦法揭露中國法西斯的罪惡（思想、制度、特點和行爲）」，毛並代中共中央宣傳部起草致各中央局、中央分局並

民出版社，1953〔重排直排本〕]，頁 905-912）中對當時國府當局對中共的言論與軍事攻勢有嚴厲的批判（中共當時的反應文件很多，不詳舉）；日後周恩來更系統化地以所謂「第三次反共高潮」這一論點來描述《中國之命運》發表後的國共對立情勢（周恩來，〈論統一戰線（1945 年 4 月 30 日）〉，收入：《周恩來選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頁 203）；當然，「第三次反共高潮」不是周的首創之辭，如〈對擊退國民黨第三次反共高潮後形勢的分析和關於黨的政策的指示（1943 年 8 月 13 日毛澤東致各中央局、中央分局並呂正操、李先念、黃敬電）〉(《中共中央文件選集》，冊 12，頁 327-328），即可見早在 1943 年 8 月就已使用「第三次反共高潮」一辭，它更是日後中國大陸史家論述的基本論點（如：王功安[等主編]，《國共兩黨關係史》[武漢：武漢出版社，1988]，頁 475-478）；所以，國府當局的攻勢當是不爭之事實，迫使中共必須因應（與反擊），但對於以所謂「第三次反共高潮」這樣的觀點闡述之，在沒有更爲嚴謹的學術研究成果足可引證的情形下，暫持保留態度。

39 自 1942 年起到重慶美國新聞處服務的費正清，曾描述學界對《中國之命運》的負面反應（Fairbank, *Chinabound*, pp. 252-253）；不過，費正清對《中國之命運》亦無好評，說它是「爲達成政治目的而惡意利用歷史」（引自：Paul M. Evans, *John Fairbank and the American Understanding of China*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88], p. 87），而且當時他亦明顯支持中共（余英時，〈費正清與中國〉，收入：氏著，《中國文化與現代變遷》[台北：三民書局，1992]，頁 144-165），故他在 *Chinabound* 中引用當年的報告，或不免有所偏頗，未必盡爲實錄；但即如余英時徵引馮友蘭回憶與胡適日記等資料，說明費正清當年判斷國民黨已失去人心，故其所述亦並非全然虛構。

40 延安《解放日報》即刊佈甚多批判文章，如：陳伯達，〈評《中國之命運》〉（1943 年 7 月 21 日）、范文瀾，〈誰革命？革誰的命？〉（1943 年 8 月 1 日）、呂振羽，〈國共兩黨和中國之命運[駁蔣著《中國之命運》]〉（1943 年 8 月 7 日），其他點名批判文章甚多，不詳舉；以批判「中國式的法西斯主義」爲論旨的文字，亦不可勝舉（如：〈社論：抗戰與民主不可分離——祝第二屆聯合國日〉[1943 年 6 月 14 日]、〈社論：請重慶看羅馬〉[1943 年 8 月 21 日]等）。

轉各區黨委電，指示宣傳〈評《中國之命運》〉一文之具體方法，並表示「應乘此機會作一次對黨內黨外的廣大宣傳」，[41] 即爲一例。[42]

這種國、共領導人（與其支配下的宣傳部門）相互攻擊、批判的行動及言論，是 20 世紀中國人政治生活中普遍的經驗，毋庸多言。但是爲什麼當時中共特別有這種「反中國的法西斯」觀點和思路，並形成反擊的言論政策？[43] 文獻難徵，很難提出概括性較強的解釋。初步而觀，我們或可將之視爲中共「整風」運動的一個部份，企圖透過言論反擊和宣傳，統一中共黨內及治下群眾對於國民黨及蔣介石的認識觀點。[44] 劉少奇給陳毅、饒漱石的指示電文，就透露了這樣的訊息：

> 應在人民中、並在我黨我軍內部的人員中，掃除國民黨及蔣介石的影響，並且極力宣傳只有中國共產黨才能挽救中國民族於危亡，以打破人民甚至黨內某些幹部中對蔣介石的幻想，和提高我黨的威信。

劉少奇並提出進行各項「在黨內外進行深入的宣傳教育，並藉此在黨內加緊階級教育」的要求。[45] 中共在 1943 年 7 、 8 月間也發佈了不少類似的指示文

---

41 毛澤東，〈關於公布〈評《中國之命運》〉一文（ 1943 年 7 月 21 日）〉，收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文集》，卷 3（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6 ），頁 49-51。

42 中共領導階層類似的其他指示很多，如：毛澤東、周恩來，〈關於發動反對中國的法西斯主義的宣傳運動給董必武的電報（ 1943 年 8 月 11 日）〉，《毛澤東文集》，卷 3 ，頁 64-65 、劉少奇，〈關於加緊進行階級教育打破對國民黨的幻想的指示（ 1943 年 7 月 23 日）〉，收入：中央統戰部、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文件選編》（北京：檔案出版社， 1986 ），下冊，頁 659-660 ；周恩來更起草〈論中國的法西斯主義：新專制主義〉（《周恩來選集》，頁 142-156 ；此文撰於 1943 年 8 月 16 日[《周恩來年譜》，頁 562]），不詳引。

43 即如周恩來在〈論中國的法西斯主義：新專制主義〉指出：「有人問，爲什麼不早說蔣介石國民黨是法西斯主義，偏偏現在來說？」周的回答是，因爲其「抗戰作用日益減少，反動方面日益擴大，並且著書立說，出了《中國之命運》一書。這樣下去，必致抗戰失敗，內戰重起」（《周恩來選集》，頁 142-143 ）。但這等言論應當視爲中共方面自我證明其發動攻擊性言論與行動之正當性(legitimacy)的措辭，未必確能代表其用心所在。

44 筆者亦不否認這些言論可能對其他人物（如國外人士）形成影響，甚至產生形成國際輿論壓力的作用，如毛澤東指示董必武，希望他能「影響美英各國、各小黨派、各地方乃至文化界方面」（毛澤東，〈關於公布〈評《中國之命運》〉一文〉，頁 49 ）；惟這一方面問題所涉廣泛，暫不討論。

45 劉少奇，〈關於加緊進行階級教育打破對國民黨的幻想的指示（ 1943 年 7 月 23 日）〉，

件。[46]

當時中共黨內成員及治下群眾對國民黨、蔣介石的認識觀點究竟如何，難知其詳；以當時到中共中央黨校受訓的幹部[47]爲例，確實有不少人「對於資產階級、對於孫中山、對於蔣介石有許多模糊觀念」，甚至對「蔣介石有沒有革命性」這個問題爭論得很厲害。[48]這樣的情勢，在在顯示中共當局認爲必須對國民黨、蔣介石進行批判與反擊，以統一中共黨內及治下群眾的認識觀點。雖然，稍後毛澤東與中共中宣部都有「暫時停止揭露國民黨」，「以示緩和」的指示，[49]但在內部並未停止對國民黨、蔣介石的批判，如〈中央宣傳部關於進行階級教育問題的通知〉中即說：《解放日報》與新華社「對國民黨反動派的宣傳戰雖告一段落，但各地的階級教育（即十大政策中的時事教育），仍應毫不放鬆地有系統地進行之」，宣傳目的之一即是「在事實方面暴露國民黨蔣介石反動派特務機關之一切禍國殃民的罪惡」。[50]是以，

《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文件選編》，下冊，頁 659-660。

46 例如：〈中央總學委關於在延安進行反對內戰保衛邊區的群眾教育的通知（1943 年 7 月 11 日）〉，《中共中央文件選集》，冊 12，頁 271-273、〈對敵後工作方針、政策和任務的指示（1943 年 7 月 30 日毛澤東致彭德懷及各中央局、分局、區黨委電）〉，同書，頁 323-324（此文收入《毛澤東文集》第 3 卷題爲〈對審幹的九條方針和在敵後的八項政策〉[頁 52-54]）、〈中央總學委關於進行一次國民黨的本質及對待國民黨的正確政策的教育問題的通知（1943 年 8 月 5 日）〉，同書，頁 325-326。

47 依據〈中央黨校計劃〉規定，入校學生的條件之一是：「地委、地常委（擔任常委工作一年以上）及旅團級、個別縣書之幹部」（《整風學習》，集 2，頁 326），在〈中國共產黨中央黨校第二期招收新生簡章〉（同書，頁 332-333）與〈中國共產黨中央黨校招收新生規定〉（同書，頁 334-337），規定較爲繁複，但都規定各級幹部成員始有資格報考入學；中共中央黨校開學的時間是 1942 年 2 月 1 日（姚仲明、王澤民，〈黨校的文化教育與藝術創新〉，《整風學習》，集 1，頁 147）。

48 李兆炳，〈我在延安中央黨校學習的三年〉，《整風學習》，集 1，頁 69-70；李兆炳在 1942 年 12 月起到中央黨校「學習」，1944 年 3、4 月間調任中央黨校三部的組教科長，他的述憶，即正是與中共發動「反中國的法西斯」行動和言論同一時段前後的情況。

49 〈毛澤東關於暫時停止揭露國民黨以示緩和問題致董必武電（1943 年 10 月 5 日）〉，《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文件選編》，下冊，頁 669、〈中央宣傳部關於學習和散發"評國民黨十一中全會及三屆二次國民參政會"的文件以及暫時停止揭露國民黨以示緩和問題致各中央局電（1943 年 10 月 5 日）〉，同書，頁 670。

50 〈中央宣傳部關於進行階級教育問題的通知（1943 年 10 月 21 日）〉，《中共中央文

筆者認為，中共這種標舉著「反中國的法西斯」的觀點和言論，即便可能未曾涵括為「整風」之一部，但就像其他類型的「整風」行動對中共自身得以推動思想領導與一元化政策之落實的作用一樣，[51] 中共當局也冀望「反中國的法西斯」的觀點和言論，能夠讓黨內成員及治下群眾對國民黨、蔣介石有一致的認識。

整體而言，後來也被中共列為「整風」文件的〈甲申〉，未必即是受中共「反中國的法西斯」反擊政策之指示（或命令）的直接產物；它的問世，可能也不是中共某位領導人物直接授意的結果；[52] 然而，正是在這樣的政治脈絡下，[53] 文化人結合、組織起來，呼應「反中國的法西斯」觀點與反擊政

件選集》，冊 12，頁 365-367。

51 參見：陳永發，《延安的陰影》（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

52 如前所述，〈甲申〉與《群眾》「紀念甲申三百年」專題的問世，可能是于懷（喬冠華）與文化人秘密組織、計劃的行動，但一方面不能判斷他當時（特別是在中共黨內）的具體職務，也未見是否經中共領導階層（如周恩來或董必武）之授意的資料，所以我們不該匆促做出這是受中共領導階層指揮之行動的結論，如〈郭沫若的史學〉（收入：史學史研究室[編]，《新史學五大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6]）說〈甲申〉之問世，是「《新華日報》的負責人想藉此紀念之事，活躍一下對明亡史的討論和研究」（頁 8），即是過份推論。

53 在〈甲申〉問世的稍後時段裡，另外還出現文化人以爭取言論、出版自由等為訴求的行動，當 1944 年 5 月國民黨召開 5 屆 12 中全會時，文化人聯名提出〈重慶文化界對言論出版自由意見書〉與〈重慶文化界為言論出版自由呈中國國民黨十二中全會請願書〉（均收入：《南方局黨史資料・文化工作》，頁 192-195；據《南方局黨史資料・文化工作》編者說明，這 2 份〈意見書〉與〈請願書〉是 1944 年 5 月 30 日時「重慶文化界人士五十餘人假百齡餐廳舉行茶會，商討言論出版自由等問題」的成果，〈請願書〉共有 78 人署名，郭沫若亦列名其中[頁 195]；然是日郭氏全家遷回位於賴家橋的鄉居[《龔譜》，中冊，頁 577；《王譜》，上冊，頁 476]，是則他可能未參加此一聚會，何以列名其中，不得而知）；郭沫若個人在 1944 年春、夏間亦有不少論旨相似的文章（如：〈答費正清博士〉[1944 年 4 月 21 日，收入：氏著，《沸羹集》〔上海：大孚出版公司，1947；筆者所見為 1950 年版〕，頁 172-175，《全集》文學編，19:439-442]、〈為革命的民權而呼籲〉[1944 年 6 月 13 日，《沸羹集》，頁 191-199，《全集》文學編，19:458-466]等，不詳舉）；不過，這些文化人集會共商採取行動的政治鬥爭意義較高，且一直延續到翌年（如 1945 年 2 月有〈重慶文化界對時局進言〉[原刊：《新華日報》1945 年 2 月 22 日，收入：《南方局領導下的重慶抗戰文藝運動》，頁 264-269]；當然，此事與中共之策動有關[陽翰笙，《風雨五十年》，頁 303-305]），乃至戰後（如 1945 年 9 月有〈成都文化界對時局的呼籲〉[原刊：《新華日報》1945 年 9 月 29 日，收入：《南方局黨史

策，終致有〈甲申〉（與相關文章）的問世。

總結論之，和中共關係深厚的郭沫若，在文化戰場上本有其作用。他與中共關係密切的文化人，以「紀念明亡三百週年」爲主題，結合、組織起來，「以史爲鑑」，撰文立說，企望爲中共「反中國的法西斯」觀點，提供持續的攻擊火力，取得文化鬥爭場域裡的優勢地位，應該是他承負寫作〈甲申〉的政治用心。

三、郭沫若寫作〈甲申〉的心路旅程

郭沫若寫作〈甲申〉的政治因素儘管相當濃重，但我們不該純粹從政治層面解釋它的問世。[54] 筆者認爲，他的創作興趣——特別是將歷史題材戲劇化的創作興趣——也是〈甲申〉呱呱落地的因素。

郭沫若在寫作〈甲申〉前幾個月裡投注心力的工作方向，是先秦社會與意識形態的研究，明季流寇史事不是研究工作的重點。據其自述，他從 1943 年 10 月到 1944 年 1 月 20 日間完成了〈韓非子的批判〉，緊接著自 1 月 20 日起開始準備撰寫〈由周代農事詩論到周代社會〉，至 2 月上旬完成；此一期間還寫了其他幾篇雜文。[55]

不過，他在此之前確實稍曾涉足於明季史事，主要原因在於歷史劇的創作興趣及需要。當郭沫若「自從知道夏完淳的存在，便很想把他戲劇化」，[56]

資料·文化工作》，頁 202-206]），至 1946 年 1 月政治協商會議召開時仍頗有所見（如：〈昆明文化界人士致政治協商會議意見書〉[原刊：《新華日報》1946 年 1 月 24 日，收入：重慶市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中共重慶市委黨校〔編〕，《政治協商會議紀實》〔重慶：重慶出版社，1989〕，頁 306-307]，不詳舉）；因此，筆者不將這個行動列入考量的脈絡。

54 如林甘泉、黃烈主編的《郭沫若與中國史學》（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即以「理論與政治的雙重責任」的觀點，說郭沫若「不得不中斷了自己從事多年且正在進行的對中國古代社會的研究，而來完成這個自己並不十分熟悉的研究課題」（頁 387-388）。

55 郭沫若，〈後記〉，《十批判書》，頁 415-417，《全集》歷史編，2:473-475；並參見：〈郭沫若著譯繫年〉，《資料》，下冊，頁 571-576。

56 郭沫若，〈夏完淳〉（1943 年 4 月 16 日），《歷史人物》，頁 141，《全集》文學編，

所以，從 1943 年 3 月下旬起，他在創作描寫明末「神童」夏完淳事蹟的歷史劇《南冠草》的前後，[57] 即曾考述其生平與時代，寫成〈夏完淳〉，[58] 以為創作之準備，從而亦涉足於明季史事，他更企圖把夏完淳和李自成、張獻忠結合起來，卻徒勞無功。[59] 可見，他是出自於對歷史劇的創作興趣及其需要，才涉足此一領域，並不是想將研究領域轉移為探討明季流寇史事。然而，當郭沫若允諾撰寫以「紀念明亡三百週年」為主題的文章後，開始接觸這方面的史料，所知越廣，竟像他接觸夏完淳事蹟而想將之創作為歷史劇一樣，他也產生了想將明末流寇史事——尤其是李巖的故事——戲劇化的欲望，終而也促使他寫成了〈甲申〉。

他致函給當時對明史頗有涉獵的翦伯贊[60] 求教時云：[61]

> 近於友人處得見一乾隆年間之抄本《剿闖小史》寫李自成事頗詳，甚引起趣味，有李信一名李巖者，乃河南舉人，參加當時活動。此人尤有意思。關於此時期之史料，兄諒知之甚悉。除《明亡述略》曾略見李信外，它尚有所見否？乞示知一二。

顯示郭沫若當時對明季史料接觸不多，故還需向翦伯贊求教。[62] 然則閱覽所及，他深感李巖此人「尤有意思」，這時可能就產生了將之戲劇化的欲望。

7:432。

57 郭沫若，〈《南冠草》日記〉，《佚文集》，下冊，頁 52-54。

58 郭沫若，〈夏完淳〉，《歷史人物》，頁 120-161，《全集》文學編，7:413-448。

59 參見：郭沫若，〈夏完淳〉，《歷史人物》，頁 152-153，《全集》文學編，7:441、郭沫若，〈少年愛國詩人夏完淳〉（1948 年 5 月作），《佚文集》，下冊，頁 265-266，《全集》文學編，7:456-457。

60 明季史事是翦伯贊戰時的治史重點之一，有〈遼瀋淪陷以後的明王朝〉（原刊：《中蘇文化》，卷 7 期 3[1940 年 9 月 18 日]，收入：氏著，《中國史論集》[重慶：文風書局，1943；筆者所見為：上海：文風書局，1947 年版]，改篇名為〈遼瀋淪陷以後的明史〉[頁 217-234]）、〈論南明第二個政府的鬥爭〉（原刊：《中蘇文化》，卷 8 期 1[1941 年 1 月 25 日]，《中國史論集》，頁 235-254）等論著。

61 郭沫若，〈致翦伯贊·十一（1944 年 2 月 8 日）〉，《佚文集》，下冊，頁 13-14，《書信集》，上冊，頁 536。

62 〈甲申〉引用之史料，除致翦伯贊函提及的《剿闖小史》、《明亡述略》外，更有所增（參見本文註 78），略可推想，翦伯贊或確曾有助益；但是否如此，史料有闕，不敢遽斷。

就各項資料相互排比參證，可以看出他想將明末流寇史事（特別是李巖的故事）戲劇化的欲望相當強烈。他在給費正清的信中說（1944 年 4 月 21 日）：[63]

> 近幾個月來，我在研究明朝末年的歷史……打算把李自成所代表的農民運動寫成劇本……我的計畫，停一下還是要用全力來實現它的……

另一封給翦伯贊的信中則說「因資料未備，未寫預定之劇本」；[64]《十批判書》的〈後記〉（1945 年 5 月 20 日）中也說，當他讀到《剿闖小史》的古抄本，明末農民運動的史實以莫大的力量，引起了他的注意力，適逢那一年又是甲申年，因此，歷史劇創作慾又有些蠢動了，想把李巖、紅娘子搬上舞臺；[65] 他在〈關於李巖〉（1946 年 3 月 12 日作）一文裡，仍念念不忘該如何處理以李巖爲主角的歷史劇；[66] 而後在亦收有〈甲申〉的《歷史人物》這部書的〈序〉（1947 年 7 月 21 日）中說，「有好些研究是爲創作的準備而出發的」，「但有些創作流產了，而只剩下些研究文字」，「如像〈萬寶常〉、〈甲申三百年祭〉都是」。[67] 凡此均可推想當初他在接觸這個主題時，

---

[63] 郭沫若，〈答費正清博士〉，《沸羹集》，頁 172，《全集》文學編，19:439-440；當然，〈答費正清博士〉是篇有政治意義的文章（余英時，〈費正清與中國〉，頁 149-151），但不應因之看輕郭沫若此文「夫子自道」的史料意義。

[64] 郭沫若，〈致翦伯贊・十三（1944 年 7 月 10 日）〉，《佚文集》，下冊，頁 15，《書信集》，上冊，頁 538；這裡所說的劇本應即是致函費正清所說的「打算把李自成所代表的農民運動寫成劇本」。

[65] 他甚至說因此想要告別「古代研究」，但以各種因素終究未能確實做到（郭沫若，〈後記〉，《十批判書》，頁 417-418，《全集》歷史編，2:475-476）。

[66] 郭沫若，〈關於李巖〉，《歷史人物》，頁 119，《全集》歷史編，4:206。唯此文繫年略需考訂：《歷史人物》版文末繫年做「2 月 12 日夜於重慶」（頁 119），《全集》版做「1946 年 2 月 12 日夜於重慶」（《全集》歷史編，4:206）；而《王譜》（上冊，頁 520）、《龔譜》（中冊，頁 646）、〈郭沫若著譯繫年〉（《資料》，下冊，頁 600）及〈[郭沫若]著譯繫年目錄——解放前部份〉（《專集》，冊 2，頁 260）皆繫年於 1946 年 3 月 12 日，並有此文原刊於《清明》月刊創刊號（上海：1946 年 5 月 1 日）之記載；《資料》與《專集》並皆註明：「此篇寫作時間《歷史人物》、《沫若文集》署 1946 年 2 月 12 日」。但筆者未能覓得《清明》月刊原刊本，故不能查覈。此處暫不從《歷史人物》版及《全集》版文末之繫年。

[67] 郭沫若，〈序〉，《歷史人物》，頁 1-2，《全集》歷史編，4:3-4。

想要將之戲劇化的欲望有多麼強烈。[68]

再參照郭沫若對歷史劇創作的整體觀點，也可以發現，他想將「甲申」這個主題戲劇化的欲望，並不是他的創作史裡的個例。

整體而言，郭沫若會在接觸和研究歷史資料的過程中，對某些歷史人物和故事產生興趣，或對某些歷史現象和事件有新的體認，都引起了創作歷史劇的欲望：

> 寫歷史劇可用《詩經》的賦、比、興來代表。準確的歷史劇是賦的體裁，用古代的歷史來反映今天的事實是比的體裁，並不完全根據事實，而是我們對某一段歷史的事跡或某一個歷史人物，感到可喜可愛而加以同情，便隨興之所至而寫成的戲劇，就是興……

他的《孔雀膽》、《屈原》，就是「在這個興的條件下寫成的」。[69]

這種接觸歷史題材「興之所至」的念頭，在郭沫若的創作史上屢見不鮮。他接觸「戚繼光斬子」的傳說，就想將之「戲劇化」，但因資料不足，恐「不免有使民族英雄漫畫化的危險」，劇本的計劃「只好流產了」。[70] 他於 1942 年 5 月底起遊覽四川的抗元名城釣魚城時，也對當時的史事及人物發生興趣，搜集不少資料，「想根據這一次的收穫再來寫一個劇本」。遊歷歸來，寫成了〈釣魚城訪古〉，做爲「想把釣魚城的故事寫成史劇的調查工作」。不過，這部史劇並未寫成，此文也變成「作爲創作的準備」的研究文章。[71] 由此可見，郭沫若會因爲對某些歷史題材的濃厚興趣，產生了創作爲歷史劇的欲望和激情，促使他進一步搜集資料，寫成相關的研究文章，做爲創作的準備。但也常因爲資料方面的限制，甚或興趣轉移，創作並未完成，只留下了研究文章。〈甲申〉之問世，亦可如此觀之。

---

68 從郭沫若在〈甲申〉對李巖的好評來看，更可想見他強烈企圖將之戲劇化的欲望；詳下。

69 郭沫若，〈談歷史劇〉，《佚文集》，下冊，頁 146-147。

70 郭沫若，〈續談戚繼光斬子〉，《全集》歷史編， 3:349-351 ；郭沫若徵集戚繼光之資料的情況，參見：郭沫若，〈戚繼光斬子〉，《全集》歷史編， 3:346-348 ，並參見：郭沫若，〈致王治秋（ 1940 年 2 月 19 日）〉，《佚文集》，上冊，頁 372。

71 郭沫若，〈釣魚城訪古〉，收入：氏著，《今昔蒲劍》（上海：海燕書店， 1947 ），頁 104-132 ，《全集》歷史編， 3:352-381 。

從郭沫若對歷史劇創作興趣的整體脈絡觀察，可以推斷他寫作〈甲申〉的心路旅程：他允諾撰寫「紀念甲申三百年」的文章後，開始接觸《剿闖小史》等史料，披覽之際，竟產生了想把流寇史事——特別是李巖的故事——「戲劇化」的興趣，於是著手搜集文獻，期間並致函翦伯贊求教，希望能多看到一些資料。然在此後，一方面由於「資料未備，未寫所預定之劇本」；[72] 一方面也因爲〈甲申〉引起了「糾紛」，打擊了寫作興趣，創作計劃也就稍有耽擱。[73] 不過，他的創作興趣依舊不減，仍然繼續注意相關文獻，像查繼璜的《罪惟錄》、吳梅村的《鹿樵紀聞》與無名氏的《檮杌近志》，就是前所未見的。[74] 然則，列爲計劃的這部史劇，醞釀了兩年多，到最後，顯然因爲知道已經有人依同樣的題材寫出劇本，[75] 兼之，他也深感以史劇的方式處理這段繁複的歷史頗有困難，終究未嘗著筆。[76] 結果，以明季流寇史事爲題材進行創作歷史劇準備過程，雖然持續甚久，卻始終不曾完成劇本，只留下來〈甲申〉這一篇文章。因此，儘管〈甲申〉問世後激起政治領域中的風雪波紋，但政治因素並不是它問世的唯一理由；它也是郭沫若接觸歷史題材時，意欲將之「戲劇化」傾向下的產物。

---

72 郭沫若，〈致翦伯贊・十三〉，《佚文集》，下冊，頁 15，《書信集》，上冊，頁 538；需注意這封信的日期是 1944 年 7 月 10 日，其中除提到「資料未備，未寫所預定之劇本」外，當時的工作是「目前正草〈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據《十批判書》的〈後記〉，〈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的寫作時間是 1944 年 7 月 3 日至 18 日(《十批判書》,頁 418-419，《全集》歷史編，2:476-477）。

73 郭沫若，〈抗戰八年的歷史劇（1946 年 4 月 3 日在重慶的戲劇工作者協會籌備會第一次學術演講會演講的記錄）〉，《佚文集》，下冊，頁 113-114。

74 郭沫若，〈關於李巖〉，《歷史人物》，頁 118-119，《全集》歷史編，4:205-206。按，《罪惟錄》、《檮杌近志》與《鹿樵紀聞》，皆〈甲申〉所未引（參見本文註 78）。

75 郭沫若在〈關於李巖〉中說，「近見蘇北出版社的平劇《九宮山》（擊楫詞人試編），主要是根據《甲申三百年祭》所改編的」（《歷史人物》，頁 119，《全集》歷史編，4:206）；他在〈抗戰八年的歷史劇〉的演講中，除了提到《九宮山》外，還說：「在山東方面，有話劇《甲申記》」（〈抗戰八年的歷史劇〉，《佚文集》，下冊，頁 114）。

76 郭沫若在〈關於李巖〉說要把李巖和紅娘子的故事寫成劇本「在處理上也頗感覺困難」（《歷史人物》，頁 119，《全集》歷史編，4:206），在〈抗戰八年的歷史劇〉又說，「把這樣繁雜的事件，包括在一個劇本裡，是不大容易的事，就沒動手寫」（《佚文集》，下冊，頁 113-114）。

四、〈甲申〉的論旨

〈甲申〉的問世，有政治層面的因素，也夾雜著郭沫若將歷史題材戲劇化的創作興趣。不過，它會激起政治風波，主要是論旨所在與閱讀者從中獲致的「體會」與「教訓」。接觸流寇史料時間未久，[77] 涉獵不廣的郭沫若，以有限的史料，[78] 對這段歷史卻有獨特的詮釋。[79]

[77] 從郭沫若個人敘述的寫作經歷來看，他在 1943 年 10 月到 1944 年 2 月上旬，主要的工作是撰寫〈韓非子的批判〉、〈由周代農事詩論到周代社會〉及其他幾篇雜文（參見本文註 55），在此期間，與于懷等人會談決議以「紀念明亡三百年」爲主題撰文立說（依柳亞子所述，時在 1944 年 1 月 15 日；參見本文註 8），但恐係至同年 2 月上旬完成〈由周代農事詩論到周代社會〉後始著手爲之（蓋他向翦伯贊求教的信，發於 2 月 8 日[參見本文註 61]），又據于立群所述，〈甲申〉脫稿於 3 月 10 日（參見本文註 32），是以，他用以閱讀明季史料、撰寫〈甲申〉的時間當約是從 1944 年 2 月上旬到 3 月 10 日，前後約 1 個月。

[78] 〈甲申〉徵引的史料，共計 7 種，依引用先後，排列如下：

書名	《歷史人物》頁數	書名	《歷史人物》頁數
《明史》 〈流賊[寇]傳〉 〈馬士奇傳〉 〈崔呈秀傳〉 〈劉理順傳〉	 頁 92 頁 97 頁 105 頁 111	《明季北略》	頁 93
《明亡述略》	頁 95	《烈皇小識》	頁 98
《剿闖小史》	頁 102	《芝龕記》	頁 103
《甲申傳信錄》	頁 103		

其中《剿闖小史》爲「演義本的小說」（頁 103）、《芝龕記》爲「以秦良玉和沈雲英爲主人翁的院本」（頁 103）；得知而未見之資料有《懿安后事略》（頁 111）、《明懿安皇后外傳》（頁 111）；又，郭所見《剿闖小史》爲手抄本（參見〈致翦伯贊・十一〉，參見本文註 61），筆者所見《剿闖小史》版本，封面署名《李闖王》（內頁側標或做《剿闖小史》、或做《李闖小史》，版權頁則做《李闖小史》，重慶說文社 1944 年 3 月初版；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藏），書前張繼〈李闖賊史序〉云：「《李闖賊史》十卷，明懶道人所著，山東圖書館所藏抄本」，「衛君聚賢，蒐印古籍，謀於余，余曰：今逢崇禎殉國第五甲申，曷刊此書，以儆國人。衛君乃任校勘之役」；書末有郭沫若（署名鼎堂）〈跋〉（文末繫年爲 1944 年 1 月），云：此書「殆前清乾隆年間所抄錄」，「書名未能一致」，「作者署名亦前後歧異」，「寫作年代大抵在甲申乙酉之間」；郭沫若認爲，此書「作爲平話小說，實甚拙劣，但可作爲史料觀。觀其所紀，與《明季北略》多相符，後書似尙有錄取本書之處，如李信諫自成四

郭沫若首先點明了「紀念甲申三百年」的意義，因爲「規模宏大而經歷長久的農民運動[革命]，在這一年使明朝最專制的王權統治崩潰了，而由於種種的錯誤卻不幸換來了異族[清朝]的入主，人民的血淚更潛流了二百六十餘年。這無論怎樣說也是値得我們回味的事」。他主要的論議，是從政治層面來分析「種種的錯誤」的原因。他認爲，固然天災釀成了饑荒，成爲流寇的起源，但無論是饑荒或盜賊，事實上都是政治——特別是明崇禎帝的失策——促成的。被郭沫若批評爲「實在是一位十分『汲汲』的『要譽』專家」的崇禎帝，顯然並沒有徹底改革的決心，以致當李自成、張獻忠勢成燎原之際，仍不曾有任何足以「收拾人心」的政策。對比於崇禎帝的失策，郭沫若則推崇李自成的作風，說他「很能收攬民心，禮賢下士，而又能敢作敢爲的那一貫作風，和劉邦、朱元璋輩起於草澤的英雄們比較起來，很有過之而無不及的氣概」。然而，起事後時勝時敗的李自成，勢力的轉機、作風的轉變，郭沫若除歸因於自然因素之外（他認爲，主要是河南自崇禎 10 年以來不斷發生蝗旱，使李自成得到死灰復燃的機會，是他勢力上的一個轉機），他更強調這個轉變，「在各種史籍上是認爲由於一位『杞縣舉人李信』的參加」。

這位李信，也就是眾說紛紜的李巖（岩）。是否確有李巖其人及其生平，是研析明末流寇史事的爭議之一。[80] 不過，郭沫若毫不懷疑李巖存在的真實

事及與宋獻策論明制科之不足以得人才等節，幾於一字不易，而《北略》多有奪字奪句。又與《明史》〈流賊傳〉則大有出入，〈流賊傳〉繩伎紅娘子救李信出獄事，最宜於做小說材料，而本書則無之，足證本書之成實遠在《明史》之前也」，郭並「校讀一過」、「略施標點」（頁 135-138）；據云，此書係由郭介紹重慶說文社出版（王錦厚，《郭沫若學術論辯》，頁 125-126；另一種說法是：「重慶說文社根據排印再出版，他特別邀請郭沫若寫“跋”」[葉桂生、謝保成，《郭沫若的史學生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2〕，頁 180]；但所云「他特別邀請」之「他」爲何人？則未明言）；郭則於〈甲申〉中說「《剿闖小史》不久將由說文社印行」（《歷史人物》，頁 102-103）；在〈關於李巖〉中另引《罪惟錄》、《檮杌近志》與《鹿樵紀聞》（《歷史人物》，頁 118-119，《全集》歷史編，4:205-206）。

79 以下引述〈甲申〉內容之處，除有特別需要說明者外，不一一註出頁碼；徵引文字，悉依《歷史人物》一書爲準，有出入者，加[ ]表示爲《全集》歷史編之文字。

80 1949 年前，也有史家確信李巖其人與其對李自成起事之貢獻（如：趙宗復，〈李自成叛亂史略〉，《史學年報》，卷 2 期 4[北平：燕京大學歷史學會，1937 年 12 月]，頁 138-139、李文治，《晚明民變》[上海：中華書局，1948；筆者所見爲：上海：上海書店、北京：

性：他的生平事蹟不但是〈甲申〉論述的主體，[81] 還對他有高度的評價。

郭沫若認爲，有了李巖「入夥」，「明末的農民[革命]運動才走上了正軌」，在李巖加入後，「接著便有牛金星、宋獻策、劉宗敏、顧君恩等的參加，這幾位都是闖王部下的要角。從此設官分治，守土不流，氣象便迴然不同了。全部策劃自不會都出於李巖，但李巖總不失爲一個觸媒，一個引線，一個黃金台上的郭隗吧」；又說李巖「對於宣傳工作特別高妙」，如派遣黨羽喬裝商賈，四出傳言「闖王仁義之師，不殺不掠」，編口號使小兒歌頌「闖王」，把軍事與人民打成了一片，使李自成部隊「所至風靡」。郭沫若認爲，

中華書局〔聯合出版〕，1989〔景本〕]，頁 103-104；又，據其〈緒論〉，此書初稿完成於 1944 年秋，屢有修增後始於 1948 年出版）；1949 年後，中國大陸學界討論李巖的文獻很多，主要的焦點爲是否確有其人、他在明末「農民戰爭」的作用應如何評價等（參見：佐藤文俊，《明末農民反亂の研究》，頁 294-300、補記[頁 308]、欒星：《甲申史商——李巖之謎》[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6]）。

81 仔細探究〈甲申〉中論述李巖之史蹟的篇幅份量，即可顯示此一跡象：

主題	《歷史人物》頁數 （《全集》歷史編頁數）
李巖「入夥」的敘述與時間考訂	頁 98（第 2 段）～頁 102（第 2 段） （4:184-188）
李巖的出身、思想傾向與紅娘子的傳說	頁 102（第 3 段）～頁 104（第 1 段） （4:188-190）
李巖會見李自成及其貢獻	頁 104（第 2 段）～頁 106（第 3 段） （4:190-193）
李巖「保持清醒」，與牛、劉等作風有異	頁 109（第 2 段）～頁 112（第 4 段） （4:195-198）
李巖與宋獻策	頁 112（第 5 段）～頁 114（第 5 段） （4:198-201）
李巖的悲劇結果	頁 116（第 1～5 段） （4:202-203）
對李巖悲劇的意義闡釋	116（最後 1 段）～頁 117（第 2 段） （4:203-204）

〈甲申〉全文共 27 頁（《歷史人物》，頁 91-117），述及李巖的篇幅合計約 19 頁（比例佔 70.37%）；再扣除篇首以 5 頁半左右的篇幅批評崇禎帝之失策、關於各地災荒情況之敘述（《歷史人物》，頁 91[最後 1 行]至頁 97[第 1 段]），可見對李巖史蹟之論述實爲〈甲申〉之主體；亦且，他還高度評價其人，對其悲劇命運的深致感嘆，更可見李巖在〈甲申〉的「主角」地位。

「可知李巖的收攬民意，瓦解官兵的宣傳，千真萬確地是收了很大效果」。不過，自牛金星加入李自成陣營後，李巖只受封爲「二品」的「制將軍」，「似乎已不被十分重視」，然而，闖軍攻陷北京後，李自成以下的諸將都陶醉在勝利之中，只有李巖與宋獻策仍保持清醒的態度。最後，清軍入關，李自成兵敗如山倒，李巖因牛金星的譖言而被李自成所殺。郭沫若對李巖的命運悲劇，頗致感慨：

> 李自成自然是一位悲劇的主人，而從李巖方面來看，悲劇的意義尤其深刻。假使初進北京時，自成聽了李巖的話，使士卒不要懈怠而敗了軍紀，對於吳三桂等及早採取了牢籠政策，清人斷不至於那樣快的便入了關。又假使李巖收復河南之議得到實現，以李巖的深得人心，必能獨當一面，把農民解放的戰鬥轉化而爲對異族侵略[種族之間]的戰爭。……假使免掉了這些錯誤，在民族[種族]方面豈不也就可以免掉了二百六十年間爲異族[清朝]所宰治的運命[命運]了嗎？就這樣，個人的悲劇擴大而成爲了民族[種族]的悲劇，這意義不能說是不夠深刻的。

郭沫若在〈甲申〉的結論部份，評價著：「從民族[種族]的立場上來說，崇禎帝和牛金星所犯的過失最大，他們都可以說是兩位民族[種族]的罪人」；他也再度感嘆著：「李巖的悲劇是永遠值得回味的」，不但他「個人的悲劇擴大而成爲了民族[種族]的悲劇」，就算李自成成功了，李巖的命運仍必將歸結到歷代開國功臣必遭君主屠戮的「改朝換代的公例」之中，他甚至大發李自成「代表的農民利益的運動早遲[遲早]也會變質，而他必然也會做到漢高祖，明太祖的藏弓烹狗的『德政』」之議論。[82]

---

[82] 但是，爲什麼李自成爲代表的「農民利益的運動早遲也會變質」，他「必然也會做到漢高祖，明太祖的藏弓烹狗的『德政』」？郭沫若卻沒有具體的論證。從上下文的脈絡來看，他論述李自成爲代表的「農民利益的運動早遲也會變質」的內容，當係意指李自成「必然也會做到漢高祖，明太祖的藏弓烹狗的『德政』」，難免歷來「改朝換代的公例」，亦即，他是從歷代開國功臣多慘遭屠戮下場的例證脈絡進行總結的；不過，這個論點，與 1949 年後中國大陸史學界關於「農民戰爭史」研究的爭論主題之一：「農民政權」性質的討論，雖有相當關聯，然則卻正顯示郭沫若在〈甲申〉中總結「農民戰爭史」之歷史意義的觀點，並不深刻（參見本文註 159、註 161）。

總結來看，〈甲申〉說明了「農民運動」興起的因素、肯定促成推翻明朝的「農民運動」的歷史地位，這種觀點並不獨特，1930年代中期即有史家早著先鞭。如吳晗即曾論述流寇的興起「是一個社會組織崩潰時必有的現象」，他並說若無清兵入關，以李自成爲首的「反對宦官，科舉制度，誅鋤紳富的新統治者會給未來的歷史以新的意義和設施」。[83] 不過，〈甲申〉中確實有「樹異立新」的論述，像對崇禎帝和牛金星的評價、論述李自成勢力之所以興衰的原因，則歸諸於李巖一人之身[84] 等，可以說都是郭沫若「獨到」的意見。[85] 在郭沫若筆下，三百年前「甲申」之際的歷史，彷彿值得回味省思；不過，這樣濃重的回味省思意義，與其說是紀念明室傾覆、檢討李自成

83 吳晗，〈明末流寇之社會背景〉，原刊：《大公報・史地周刊》，期5-6（1934年10月19、26日），收入：北京市歷史學會（主編），《吳晗史學論著選集》，卷2（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頁481-494；後如陳家康亦指陳崇禎時期的「農民運動」是「以反抗社會制度爲主」的行動（陳家康，〈明末農民運動研究〉，《群眾》，卷8期1、2合刊[1943年1月16日]，頁21-27）；而對比於如毛澤東對「農民起義」、「農民戰爭」的肯定與贊揚觀點（詳下），可以說，〈甲申〉並沒有突破性觀點的論述。

84 如前所述，郭沫若強調李自成的轉變由於李巖的入夥；他在述說李自成的失敗時，雖曾明白表示：「李自成的失敗，自成自己實在不能專負責任，而牛金星和劉宗敏倒要負差不多全部的責任」（頁115，《全集》歷史編，4:201），但是，必需考慮這個論斷的上下文脈絡(context)：

第一個脈絡：論述闖軍攻陷北京後，李自成及部將陶醉在勝利中，「丞相牛金星所忙的是籌備登極大典，招攬門生，開科選舉；將軍劉宗敏所忙的是拶㧽降官，搜括贓款，嚴刑殺人」，惟李巖、宋獻策仍保持清醒，反對這些做爲（頁108-114，《全集》歷史編，4:195-201）；

第二個脈絡：他論述：「李自成本不是剛愎自用的人，他對於明室的待遇也非常寬大」、「[李自成]他很能納人善言，而且平常所採取的還是民主式的合議制」（頁115，《全集》歷史編，4:201）；

可見，郭沫若是在這兩個脈絡中，做出「牛金星和劉宗敏倒要負差不多全部的責任」這一論斷的；但是，從(1)他論說李巖、宋獻策（特別是前者）之反牛、劉之行止的脈絡來看，也從(2)他更感嘆李巖悲劇命運的脈絡來看，筆者認爲，表達在〈甲申〉中對李自成失敗原因的歷史論斷，是他未曾善納李巖的意見。所以，筆者認爲，郭沫若對於李自成勢力興衰原因所在的論述，皆歸之於李巖。

85 如趙宗復述論李自成敗亡原因之一是「領袖腐化及其內訌」（〈李自成叛亂史略〉，頁156）、李文治則視軍政腐化、眾將離心爲李自成致敗癥結之一（《晚明民變》，頁163-165）。在他們的論述中，李巖之死即是他們的論述例證之一，基本觀點雖與〈甲申〉無異，但較諸郭沫若之論述，更爲多元而深入。

的失敗原因，倒不如說是對李巖悲劇命運的低吟。

亦且，在日後郭沫若論及李巖之著述中，評價李巖的調子，更是越來越高。他在〈關於李巖〉中，引用查繼璜《罪惟錄》的一段話：「李巖教自成以虛譽來群望，僞爲均田免稅之說相煽誘」，從而敘論道：[86]

> 均田兩個字是爲其它的資料所沒有的，雖然僅只兩個字，卻把李巖的思想立場表示得十分明白，這足證明李巖確不是一位尋常的人物。

他在《歷史人物》一書的〈序〉中，更有發揮：[87]

> 我們可以堅決地相信，[李巖]他一定是一位懷抱著人民思想的人，須知他是主張「均田」的。惟其這樣，所以他能夠與李自成合夥，他的參加農民革命是有他自己的在思想上的必然性，……

他甚至揚言：

> 應該把他[李巖]看成爲人民思想的體驗者、實踐者。雖然關於他的資料已經遭了湮滅，在思想史上也應該有他的卓越的地位的。

郭沫若這種以「人民思想」爲評價人物的標尺，後續發揮地更爲淋漓盡至。他在〈少年愛國詩人夏完淳〉一文中，將夏完淳與李巖進行比較，批評夏完淳雖然忠君愛國，但卻只有「民族意識而缺乏人民意識」，對比於同樣出身官宦人家，本人還是舉人的李巖，雖然他跟李自成造反是由於腐敗的官吏逼成的，「但他終於造了反，而且有了他的參加，使李自成領導的農民革命，充份地帶上了人民意識，而使那革命幾乎成功了」，[88] 贊賞無已。

---

86 《歷史人物》，頁 118，《全集》歷史編，4:205；又，《歷史人物》與《全集》歷史編徵引查繼璜《罪惟錄》文句略異，不詳考覈。

87 郭沫若，〈[歷史人物]序〉，頁 4-6，《全集》歷史編，4:5-6。

88 郭沫若，〈少年愛國詩人夏完淳〉，《佚文集》，下冊，頁 264-265，《全集》文學編，7:456；固然，郭沫若寫〈少年愛國詩人夏完淳〉的用心可能別有所指，如他在文末說：「現在是更強大的帝國主義（當係影射美國）侵蝕著我們的時候，而有些人卻比洪承疇還要無恥，夏完淳的民族性的強烈，倒依然是值得我們頌揚的。」（《佚文集》下冊，頁 266，《全集》文學編，7:456），彷彿在鼓動當時的青年向夏完淳「民族性的強烈」看齊。但撇開郭沫若論述中的現實色彩不論，整體觀察，說他評價李巖的調子越來越高，甚至有漸次誇大李巖歷史地位的傾向，應不過份。

和其他史家的論述相較，[89] 郭沫若對李巖的這些贊賞言論，清楚地呈顯出他對李巖此人生命歷程與歷史地位的獨特評價。[90]

然而，〈甲申〉的「獨特」總結，在那樣的時空背景下，卻提供了閱讀者自由反應、領會的空間，自其中汲取各式「教訓」，製造了現實世界——特別是政治領域——的波瀾。

五、〈甲申〉的現實迴響

觀察與〈甲申〉相關的歷史情境時，當然不能忽略它在當時環境下的強烈鬥爭意義。不過，它引生的現實迴響，非僅限鬥爭領域而已，更別有政治用途。

（一）對〈甲申〉的批判意見

〈甲申〉引發了又一幕戰時國共鬥爭（特別是文化鬥爭）的景勢，從當時雙方支持者的反應中明白地透露出來。《關於〈甲申三百年祭〉及其他》[91] 這種匯集批判文獻的小冊子問世，正是例證。

〈甲申〉於《新華日報》連載完畢的第二天（即 1944 年 3 月 24 日），

---

89 如趙宗復（〈李自成叛亂史略〉，頁 138-139）、李文治（《晚明民變》，頁 103-104）亦皆肯定李巖的歷史地位，也都徵引查繼璜《罪惟錄》所述之「均田」資料，但對此制是否確曾實施，都保持謹慎態度，更未標舉「人民思想」之議論。

90 亦且，如前所述，李巖史蹟之論述實為〈甲申〉之主體，郭沫若對其悲劇命運深致感嘆，更可想見他接觸這段歷史的材料時，企圖將李巖的故事戲劇化的欲望是相當強烈的，故在寫作〈甲申〉時竟對之再三致意。

91 葉青（等），《關於〈甲申三百年祭〉及其他》（重慶：獨立出版社，1944）；全書收錄 5 篇文章：葉青，〈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平議〉、黃義本，〈戰敗主義與思古幽情〉、荒民，〈「國將興，聽於人」——闢關於「甲申」的神話鬼詩〉、越客，〈甲申史料小輯〉、公孫佳，〈甲申二賊傳——李自成與張獻忠〉；另收錄《中央日報》的 2 篇社論：〈糾正一種思想〉（1944 年 3 月 24 日）、〈論責任心〉（1944 年 4 月 13 日）及《商務日報》社論：〈論赫爾的名言〉（1944 年 4 月 1 日），列為附錄；這部小冊子的出版時間，據版權頁所載是 1944 年 8 月，正是《群眾》推出「紀念甲申三百年」專題與部份唱和〈甲申〉的其他文章問世之後，可見其針鋒相對的意義；以下引用收錄於這部小冊子的文章時，只註明篇名、頁數。

《中央日報》就刊出題爲〈糾正一種思想〉的社論，說「鼓吹敗戰主義和亡國思想」即是〈甲申〉代表的思想。[92] 這篇社論的作者陶希聖回憶：[93]

> 民國三十四年是甲申年。郭沫若發表一篇文章，以「甲申三百年祭」爲題，將明末亡國的歷史影射當時的時局。最無恥的是他以「李公子」自命，說李闖王如果聽從李公子的話，必能保有江山，不致敗亡。我在《中央日報》發表社論，以「斥亡國主義」爲題，痛加抨擊。同時找出明末的史料，另作短文，證明清軍入關，只打明朝的國軍，不打李闖的寇軍。明朝失敗乃是失敗於清軍與流寇夾攻之下。那篇社論火氣很大。郭沫若一度大起恐慌，以爲國民政府就要懲治他。

隨後，重慶《商務日報》也刊出社論〈論赫爾的名言〉（1944 年 4 月 1 日）批評道：「有人寫出〈甲申三百年祭〉，散播敗戰思想，把不正確的毒素，滲進社會內層」；[94] 4 月 13 日，《中央日報》再度發表社論〈論責任心〉，認爲不能「把今日革命抗戰建國途中的中國，比擬於宋末或明末亡國時代的中國」，並說這種題材的「文學、戲劇與史論，渲染著亡國的怨望和牢騷」。[95]

代表國民黨立場的《中央日報》立即對〈甲申〉做出了反應，可以推想，《關於〈甲申三百年祭〉及其他》這部小冊子即便未經組織策畫而問世，但它必然具有深刻的反擊意義，即如其〈前言〉所言，與〈甲申〉相關的文章是：[96]

> 「回味甲申，暗示新的亡國的危機」。此種回味的宣傳，不過是應用聯想的心理來引起國人的悲觀情緒，完全是一種爲敵人做倀的戰敗主義。編者深恐這種無責任心的濫開砲，俾佈糜爛性的毒氣，影響於抗建大業民族復興，故特搜集反駁文章，編爲小冊，以供防毒銷毒之用。

有「防毒銷毒」的用心，匯集在這部小冊子的言論，都以嚴厲的筆調，

---

[92] 〈社論：糾正一種思想〉，《中央日報》（1944 年 3 月 24 日）。

[93] 陶希聖，《潮流與點滴》，頁 217；按，陶希聖此處的回憶有誤失，如誤民國 34 年爲甲申年（應爲 33 年）、其所撰《中央日報》社論應題爲〈糾正一種思想〉。

[94] 〈論赫爾的名言〉，頁 80-83。

[95] 〈社論：論責任心〉，《中央日報》（1944 年 4 月 13 日）。

[96] 〈前言〉，頁 4-5，《關於〈甲申三百年祭〉及其他》。

斥責、批評〈甲申〉及相關文章。如葉青（任卓宣）說〈甲申〉「是描寫失敗主義的一篇好文章」，「是適合共產黨需要的一篇時髦文章」。[97] 黃義本則詮釋〈甲申〉是「指古罵今」之作，表達這個甲申年「是流寇迫使國民黨煤山[上]弔的甲申年」的意義；[98] 荒民嚴詞批評「愛拿明末歷史來給現在抗戰建國的中國下註腳」，「是一種極危險的亡國思想」，寫〈甲申〉此等文章的人「無異爲敵人作第五縱隊」；[99] 越客引用史料說明「三百年前的甲申，是內憂外患交侵以招致亡國的悲劇之年」，紀念「甲申」者，「不紀念別的年份，偏紀念這亡國之年的甲申，自有他們的用意」；[100] 公孫佳則述說「甲申二賊」：李自成與張獻忠「惡貫滿盈」的下場外，並批判「郭沫若歪曲地表揚李自成張獻忠，無非是強調『成則爲王，敗則爲寇』以便爲當今割據反動作亂者張目或辯護的意思」。[101] 這些文章的措詞用字都很不客氣，〈甲申〉首當其衝。

我們無從推測這部小冊子產生了什麼樣的作用，但是，針鋒相對的意義，昭然之至，充分顯示了瀰漫於當時國共文化鬥爭場上熾熱的敵對硝煙。

（二）與〈甲申〉唱和的觀點

批判〈甲申〉的文字，筆調固然嚴厲；但與它相唱和的音符，在文化鬥爭場上的躍動卻也相當嘹亮。

與〈甲申〉發表同步，同一天的《新華日報》刊載了〈三百年前〉一文，作者署名「宗顧」，指出「現在我們正掙脫出一次新的亡國危機」，回味這段歷史「是更能感受到新鮮的意義的」，又強調「受了傳統歷史書的束縛」，將「明末的農民起義目爲寇賊，反把賣國求榮的洪承疇當做賢哲」的看法，必須翻轉過來。[102] 翌日的《新華日報》又刊載了〈甲申事變——明末的亡國

[97] 葉青，〈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平議〉，頁 1-22。

[98] 黃義本，〈戰敗主義與思古幽情〉，頁 22-37。

[99] 荒民，〈「國將興，聽於人」〉，頁 39-47。

[100] 越客，〈甲申史料小輯〉，頁 49-56。

[101] 公孫佳，〈甲申二賊傳〉，頁 57-72。

[102] 宗顧，〈三百年前〉，《新華日報》（1944 年 3 月 19 日），未見，轉引自：王守稼、

歷史〉，說明了明末的歷史變動局勢。[103]

而後，《群眾》第 9 卷第 7 期（1944 年 4 月 15 日出版）推出「紀念甲申三百年」專題，刊佈柳亞子等人的文章，環繞著明末史事的面相抒發議論。柳亞子解說朱明覆亡的前因後果外，還抒發「一姓覆字[宇？]何足道，萬家流血始堪傷」的主觀之情，以「紀念三百年前的甲申」；[104] 翦伯贊以〈桃花扇〉爲依據，描述南明弘光朝身處民族危機下，一方面是貪污腐化荒淫無恥，一方面是饑寒交迫流離死亡的情景，有嚴詞的批判；[105] 魯西良列述了明末腐敗的政治風氣，並將政治風氣的腐敗主要原因歸於「當時的最高政治當局太昏庸」，對崇禎也有「真正地道的一個亡國之君」的批評；[106] 寓曙的〈明末清初史學底時代意義〉是學術史性質的論述，闡析明末清初史學是「理學的反動」與「近代人文主義的啓蒙運動」的意義，[107] 則比較不帶政治意味。

此外，部份政治立場傾向於中共的學人，也有對〈甲申〉的欽賞論議，發表論旨類似的文章。如柳亞子的歌詠之詩：[108]

陳跡煤山三百年，高文我佩鼎堂賢。
吠堯桀犬渾多事，喘月吳牛苦問天。
由檢師心終覆國，自成失計遂捐燕。
昌言張李如能拜，破虜恢遼指顧間。

極盡揄揚〈甲申〉之能事。後來，柳亞子顯然針對著〈甲申〉受到批判的情勢，另行刊佈文章，否認據古以諷今的寫作意圖：「我們現在並沒有朱由檢（大明崇禎帝）」、「我們現在也沒有李自成」、「明季沒有我們現在的前

繆振鵬，〈《甲申三百年祭》及其在現代史學史上的地位〉，頁 89-90。

103 〈甲申事變——明末的亡國歷史〉，《新華日報》（1944 年 3 月 20 日），未見，轉引自：王守稼、繆振鵬，〈《甲申三百年祭》及其在現代史學史上的地位〉，頁 90。

104 柳亞子，〈紀念三百年前的甲申〉，《群眾》，卷 9 期 7，頁 282-283。

105 翦伯贊，〈桃花扇底看南朝〉，《群眾》，卷 9 期 7，頁 284-291。

106 魯西良，〈明末的政治風氣〉，《群眾》，卷 9 期 7，頁 292-294。

107 寓曙，〈明末清初史學底時代意義〉，《群眾》，卷 9 期 7，頁 295-297。

108 柳亞子，〈讀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一文，即其題後〉，《柳亞子選集》，下冊，頁 895。

進民眾」、「明季沒有我們現在的國際環境」，[109] 不但是對郭沫若的聲援，也有爲自己辯護的意味。

當時思想已漸次偏向於中共的吳晗，[110] 則有〈三百年前的歷史教訓〉之作，做出足可讓讀者假古鑒今的結論：[111]

> 三百年後，我們想想三百年前的情形，「殷鑒不遠，在夏后氏之世。」

又如著有《明代特務政治》一書的丁易，[112] 也發表〈莊烈皇帝與李自成〉，說李自成「失敗於滿清異族之手，這個教訓是值得思索研究的。郭[沫若]先生於此，根據史實，著重於自成幕下的李巖的不見信任這一點，指出許多失敗的原因來，更值得後人警惕」。[113]

中共的機關報：延安《解放日報》則於 1944 年 4 月 18 日、 19 日全文轉載〈甲申〉，並加按語說明，大加贊賞：

> 在這篇論文裡，郭[沫若]先生根據確鑿的史實，分析了明朝滅亡的社會原因，把明思宗的統治與當時農民起義的主將李自成的始末作了對照的敘述和客觀的評價——還給他們一個本來面目。郭先生雖然推翻了流俗關於李自成等的無知胡說，但是對於他的批評也是極嚴格的。

按語中還評說：「郭先生在他的文章裡充滿了愛國愛民族的熱情」，說那些批判〈甲申〉的言論是「以吳三桂阮大鋮自擬的人們來向他狂吠一通」，如「蚍蜉撼大樹，只是增加了郭先生的文章的歷史價值而已」。[114]

---

109 柳亞子，〈現在的中國會等於明季嗎？——我的答案是一個「不」字〉（原刊：桂林《大公報》[1944 年 6 月 19 日、 21 日]），《柳亞子選集》，上冊，頁 503-507。

110 探討吳晗於 1940 年代參與政治活動及其政治思想之轉變，成果頗多，參見：潘光哲，〈學習成爲馬克思主義史學家：吳晗的個案研究〉，《新史學》，卷 8 期 2（1997 年 6 月），註 55（頁 147）所引。

111 吳晗，〈三百年前的歷史教訓〉，原刊：昆明《正義報‧新論衡周刊》，1944 年期 9，收入：《吳晗史學論著選集》，卷 2，頁 498-500。

112 丁易，《明代特務政治》（北京：中外出版社， 1950）；但筆者未能查出他的生平資料。

113 丁易，〈莊烈皇帝與李自成〉，《大學》雜誌，卷 3 期 9、 10 合刊本（1944 年 11 月），未見，轉引自：王錦厚，《郭沫若學術論辯》，頁 140-141。

114 《解放日報》， 1944 年 4 月 18 日；據云，這份按語，此後還成爲各「解放區」翻印〈甲申〉各種版本的「前言」或「前記」（王錦厚，《郭沫若學術論辯》，頁 117）。

這些與「紀念甲申三百年」相關的文章，都以明亡史事為主軸，創論立說，與現實環境的對照意義相當鮮明；以各文作者個人的生命與學術歷程為觀察角度，這些述論明末史事的文章，對他們個人而言，更有獨特的意義。[115] 就這些述論陸續問世並引致批評等態勢來看，〈甲申〉等於是引動又一波國共文化鬥爭的第一聲槍響。

（三）〈甲申〉的政治用途

文化鬥爭的面相之外，〈甲申〉更別有政治用途，特別是中共當時仍持續推動「整風」運動，強調如何鞏固「黨的建設」的思想基礎，中共領導階層對〈甲申〉有熱烈的迴響，視之為具有產生這種作用的文獻。

透過「整風」逐漸樹立個人在中共黨內權威領袖地位的毛澤東，本來就對李自成這等「農民起義」的意義別有「領會」，高度肯定對「農民的階級鬥爭」、「農民起義」和「農民戰爭」；[116] 當他讀到了〈甲申〉後，[117] 顯然對〈甲申〉的某些論述激起了反應。但是，毛的反應，並不是郭沫若悼嘆不已的李巖悲劇命運，反而，〈甲申〉關於闖軍攻陷北京後，李自成及部將陶醉在勝利中以致敗亡的述說，才是毛著意的焦點。在被認為對中共 6 屆 7 中全會（1945 年 4 月）通過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之起草有相當影響的演講：[118] 〈學習和時局〉[119] 中，毛澤東指出，中共幹部不要再「脫離群眾，

---

115 以柳亞子為例，他在清末革命風潮影響下，17 歲就開始閱搜明季史料，始終不輟（柳無忌[編]，《柳亞子年譜》[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3]，頁 17、謝國楨，〈愛國詩人柳亞子與南明史乘〉，收入：氏著，《瓜蒂庵文集》[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6]，頁 147-152），然在中日戰爭期間，他竟自嘲以研治南明史與史料「做為破仇解恨的東西」（柳亞子，〈我的南明史料研究經過〉，原刊：《大風》，期 82[1941 年 1 月 5 日]，收入：柳無忌[編]，《柳亞子文集・南明史綱、史料》[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頁 291-311；其他文章中亦有類似之論，不詳舉），因時代變易而心境轉移的軌跡，明顯可見。

116 詳下（參見本文註 151 所引）。

117 毛澤東讀到〈甲申〉的確實時間不詳；但觀〈甲申〉初刊於《解放日報》的時間是 1944 年 4 月 18 日，距重慶《新華日報》由 3 月 19 日開始連載，相去 1 個月，可以推斷或即在 1944 年 3 至 4 月間。

118 參見：唐曼珍，《毛澤東與中共黨史學》（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3），頁

屢犯錯誤」；他還說，「我黨歷史上曾經有過幾次表現了大的驕傲，都是吃了虧的」，並以中共歷史上屢有驕傲作風以致「失敗」、「吃虧」爲例，要求：

> 全黨同志對於這幾次驕傲，幾次錯誤，都要引爲鑑戒。近日我們印了郭沫若論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們引爲鑑戒，不要重犯勝利時驕傲的錯誤。

後來，林伯渠自延安飛抵重慶，他告訴郭沫若，「黨中央、毛主席決定把〈甲申三百年祭〉作爲『整風』文件，供黨內學習，並且已經在延安和各解放區普遍印發」。[120] 郭沫若在 8 月下旬，收到周恩來托人從延安帶來的《屈原》及〈甲申〉單行本，當天他就寫信給毛、周等人「感謝他們的鼓勵和鞭策」。[121] 12 月，郭沫若收到毛澤東大發贊語的回信：

> 你的史論、史劇大有益於中國人民，只嫌其少，不嫌其多，精神決不會白費的。

毛又說：

> 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們把它當作整風文件看待。小勝即驕傲，大勝更驕傲，一次又一次吃虧，如何避免此種毛病，實在值得注意。

56-58 ；而〈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不但被認爲是「毛主義的黨史新版本」（費正清、費惟愷[主編]，劉敬坤[等譯]，《劍橋中華民國史》，下冊，頁 819 ），或「毛澤東的歷史大翻身決議」（王健民，《中國共產黨史・第三篇・延安時期》[台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988〔新版〕]，頁 148 ），對此後的中共黨史學、黨史的解釋，更有深刻的影響（張靜如、唐曼珍[主編]，《中共黨史學史》[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1990]，頁 66-78 ）。

119 毛澤東，〈學習和時局〉，《毛澤東選集》，卷 3 （重排直排本），頁 951-952 ；毛的這篇文章是將他分別於 1944 年 4 月 12 日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級幹部會議、同年 5 月 20 日於中央黨校第一部所作的報告，合併整理而成的（《毛澤東年譜》，中卷，頁 507-508 、 513 ）。

120 于立群，〈難忘的往事〉，頁 370 。林伯渠抵重慶的時間是 1944 年 5 月 17 日（《南方局黨史資料・黨的建設》，頁 335 ）；毛的〈學習和時局〉是合併整理他分別於 1944 年 4 月 12 日、同年 5 月 20 日的報告而成的，因此，毛決定把〈甲申三百年祭〉作爲「整風」文件，當是 1944 年 4 、 5 月間的事。

121 于立群，〈難忘的往事〉，頁 369 。

所以，毛甚至希望他「寫一篇太平軍經驗」，認為「會是很有益的」。[122]

從毛澤東的反應來看，他著意的是「不要重犯勝利時驕傲的錯誤」，不論李自成的教訓或太平軍的經驗，顯然都是他認為可以「引為鑑戒」、能夠避免「小勝即驕傲，大勝更驕傲」「此種毛病」的歷史教訓。毛對〈甲申〉會有這樣的反應，可以從他很早就對「流寇主義」作風提出批判，[123] 以至當時他對中共內部某些「脫離群眾」、「養成了一種驕氣」之作風的既有思考與批評[124] 這個脈絡來理解，因此特別著重這一方面的「教訓」。而從毛澤東致函郭沫若，希望郭「寫一篇太平軍經驗」的文章，他的用意，應該也是著重於太平軍攻佔南京後的種種腐化情勢而致敗亡的經驗。從這個脈絡來看，更可見毛閱讀〈甲申〉後所獲致的「教訓」。

毛的「領會」，具體反映在中共中央發佈〈甲申〉為「整風」文件的通知裡。中共總政治部、中央宣傳部在 1944 年 6 月 7 日聯合發出通知給各級黨委以及各級政治部，要他們重視〈甲申〉及蘇聯高涅楚克的劇本《前線》，並組織幹部認真學習，通知中說：[125]

> 郭文指出李自成之敗在於進北京後，忽略敵人，不講政策，脫離群眾，妄殺幹部，「紛紛然，昏昏然，大家都像以為天下就已經太平了的一樣」，實為明末農民革命留給我們的一大教訓；……

通知又說，這兩篇作品的重大意義是：

---

[122] 毛澤東，〈致郭沫若（1944 年 11 月 21 日）〉，《毛澤東書信選集》，頁 241-242；郭沫若收到毛此函的時間，參見：于立群，〈難忘的往事〉，頁 369，並參見：《王譜》，上冊，頁 486-487（《龔譜》繫年為毛之發信日[即 1944 年 11 月 21 日，《龔譜》，中冊，頁 593-594]）；而郭沫若始終並未「寫一篇太平軍經驗」的文章，還自認「是一件極大的憾事」（于立群，〈難忘的往事〉，頁 373）。

[123] 毛澤東早於 1920 年代末期就對「流寇主義」作風提出批評（毛澤東，〈關於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1929 年 12 月）〉，《毛澤東選集》，卷 1[北京：人民出版社，1952〔重排直排本〕]，頁 96-97），不詳引；當然，毛的這些批評與他個人思考中國進行「共產主義革命」策略的脈絡有關，他的這些想法當時也在中共黨內受到批判，涉及課題廣泛，不詳論。

[124] 毛澤東對這一方面的批評，參見：毛澤東，〈組織起來（1943 年 11 月 29 日）〉，《毛澤東選集》，卷 3（重排直排本），頁 936-938，不詳引。

[125] 原文未見，轉引自：王錦厚，《郭沫若學術論辯》，頁 117-119。

要我們全黨，首先是高級領導同志無論到何種有利形勢與實際勝利，……必須永遠保持清醒與學習態度，萬萬不可沖昏頭腦，忘其所以，重蹈李自成與[《前線》主角]戈爾洛夫的覆轍。

《解放日報》在發表劉子久的〈關於學習問題給淮北區黨委的信〉時，於文前〈編者按〉中也說：[126]

不久以前，我們曾發表蘇聯作家的劇本《前線》與郭沫若先生的歷史論文〈甲申三百年祭〉，並印成小冊，發給同志們閱讀，目的都是幫助同志們整風，使我們黨內的不良作風早日得到清除，正確作風早日得到普及。

毛個人的「領會」，成爲中共的政策通告頒發之後，雷厲風行。在延安，〈甲申〉即是當時在中央黨校受訓的中共幹部必須閱讀的「整風」文件之一。[127]在各「解放區」的「整風」進行方面，亦復如此。如蘇北鹽阜地區，〈甲申〉亦是必讀文件之一，華中新華書店鉛印了幾千本還不夠用，各地又油印了上萬本，使得「參加整風學習的幹部、黨員，基本上達到人手一本」。[128]

〈甲申〉由此而普及於眾，影響所至，更有形塑中共黨內意識形態的意義。當中共黨員閱讀被列爲「整風」文件的〈甲申〉而開展改造思想之際，同時構築了將毛澤東的個人意志傳達到黨員心靈深處的一個渠道，規範了黨員進行思想改造的思惟方向與觀點。當時遺留下來的部份「整風」學習筆記，即是明確的實例。[129] 如河南人曹醒群，時任 3 師 7 旅 22 團宣傳科副科長，在筆記中這樣批評自己：

---

[126] 原文未見，轉引自：劉子久，〈我是怎樣寫《給淮北區黨委的信》的〉，《整風學習》，集 2，頁 88。

[127] 李砥平，〈延安整風給我的教益〉，《整風學習》，集 1，頁 104、秦純一，〈我所體會的延安整風精神〉，《整風學習》，集 2，頁 243；傅雨田則說〈甲申〉是中央黨校「領導」另外提供的「輔助教材」（《整風學習》，集 1，頁 85）。

[128] 曹晉杰、朱步樓、陰署吾，〈《甲申三百年祭》在老解放區的影響〉，收入：中國人民解放軍文藝史料編輯部（編），《中國人民解放軍文藝史料選編——抗日戰爭時期》（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88），冊 4，頁 174。

[129] 以下所引，俱參見：曹晉杰、朱步樓、陰署吾，〈《甲申三百年祭》在老解放區的影響〉，頁 174-175。

劉宗敏思想，在我身上就有很嚴重的反映：自以爲進過抗大，在一一五師當過戰士，就目空一切，誰也看不起；講私人感情，同地方新來的同志不團結；高高在上，高談闊論，脫離群眾；生活腐化、散漫……要是大家都像我，還成個什麼革命隊伍，也不會有比李自成更好的下場。

又如甘肅人劉德才，當時擔任漣東宣傳大隊分隊長，他在筆記中說：

我們現在還沒有進城，但是已經被城裡的花花世界迷了眼，總想吃得好一點，穿得好一點，還要打扮打扮，怕人家說自己土氣，要是進了城，還能不被金錢，美女俘虜了去嗎？李自成起義軍的悲慘下場，真該我們警惕啊！

又如陝西人張碧岑，時任泗沭大隊幹事，他在學習筆記中這麼說：

李自成進了城只要親信，不要能人；親信驕傲，他能容忍；李巖直諫，他又忘能；軍心民心都散，大事自然難成。我們還未進城，自居抗日功臣；將來若是進城，難保不像李自成。這面歷史鏡子要照，不照革命難成。

再以 1945 年 2 月 2 日開學的鹽阜黨校第 3 期爲例，參加「整風」學習的一百多人，都從李闖王進京失敗的教訓，聯繫自己的作風實際，作了檢查對照。[130] 在蘇北「解放區」，透過觀賞據〈甲申〉改編的戲劇演出，也讓身歷其境的幹部回味不已，認爲有「對照批判我們的幹部在革命勝利時所最易滋長的驕傲自滿情緒、輕敵鬆懈情緒和功臣自居的情緒」的作用。[131]

這些資料明確顯示〈甲申〉對中共「整風」運動要求幹部「脫褲子，割尾巴」進行自我改造，產生一定程度的作用。但是，中共黨員閱讀〈甲申〉這份「整風」文件進行思想改造工作的基本觀點，卻都與毛如出一轍，都訴說著不要陶醉在勝利中、不要重犯勝利時驕傲的錯誤的「體會」，好比學調

[130] 曹晉杰、朱步樓、陰署吾，〈《甲申三百年祭》在老解放區的影響〉，頁 174。

[131] 陳丕顯，《蘇中解放區十年》（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8 ），頁 223 ；陳丕顯自 1941 年後擔任中共蘇中區黨委書記等職，他雖說〈甲申〉是「整風」文件之一，亦未明言是否曾閱讀〈甲申〉，僅回憶觀賞以〈甲申〉爲藍本而改編的戲劇演出後，有這些體會；至於其所言以〈甲申〉爲藍本而改編的戲劇，詳下。

發聲的鸚鵡。中共「七大」（1945 年 4 月 23 日開幕）決議將「毛澤東思想」做爲「一切工作之指針」的規定納入《黨章》，「毛澤東思想」從此成爲中共意識形態的代名詞。這般情勢，底定於成，歷經了一個長久、複雜而且帶有權力鬥爭意義的過程，不是本文的重點；然以〈甲申〉在中共「整風」運動的作用爲例，當可顯示奉「毛澤東思想」爲尊的態勢問世時的部份歷史過程：毛澤東對〈甲申〉之「歷史教訓」的詮釋，已然成爲黨員進行思想改造的「指導」，那麼，整個黨宣誓要奉「毛澤東思想」爲尊，並不意外。可以說，〈甲申〉被轉化爲促成這個情勢問世、讓「毛澤東思想」形塑黨員意識形態的工具之一。

除了中共的幹部、黨員受到〈甲申〉的洗禮外，中共控制下的各「抗日民主根據地」的普通戰士與平民百姓，透過人們喜聞樂見的戲劇藝術形式，也有親近它的機會，以〈甲申〉爲藍本的各種戲劇，陸續出現。話劇方面，有阿英（錢杏邨）的《李闖王》[132] 與夏徵農的《甲申記》；[133] 京劇方面，

---

132 曹晉杰、朱步樓、陰署吾，〈《甲申三百年祭》在老解放區的影響〉，頁 175-177、錢瓔，〈阿英在蘇北解放區的戲劇活動〉，《中國人民解放軍文藝史料選編》，冊 4，頁 178-183（特別是頁 182）、卜慶華，〈《甲申三百年祭》出版的前前後後〉，收入：氏著，《郭沫若研究新論》（北京：首都師範大學出版社，1995），頁 181-182；3 文都說阿英寫這部話劇是受新四軍三師副師長張愛萍的提議，首度公演地點是江蘇阜寧縣益林鎮郊外的廣場；不過，曹、卜 2 文繫年皆爲 1945 年 5 月 6 日，錢瓔之文則爲 1944 年 5 月 6 日。但據錢瓔對阿英撰寫此劇過程的敘述來看，他撰寫此劇的時間應是在中共宣布以〈甲申〉爲「整風」文件後的事，因此，錢瓔的繫年當有誤；關於《李闖王》一劇曾在其他地區演出的狀況的報導與回憶，還可參見：趙定、陳逖，〈戰爭年代蘇北地區的話劇活動史話〉，《中國人民解放軍文藝史料選編》，冊 4，頁 167-168、王汝俊，〈魯南劇社的戲劇活動〉，《中國人民解放軍文藝史料選編》，冊 3，頁 446-447。

133 王瑤，《中國新文學史稿》（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82[修訂重版]），下冊，頁 740-741；陳丕顯回憶，依〈甲申〉爲藍本而改編的戲劇之一，包括「夏徵農、沈西蒙、吳天石編劇、沈亞威作曲」的「《甲申祭》」（《蘇中解放區十年》，頁 223）；此外，郭沫若在〈抗戰八年的歷史劇〉中曾說他未曾寫的歷史劇「卻有人替我寫了。在山東方面有話劇《甲申記》。還有平劇《九宮山》」，但皆未提及作者是誰（《佚文集》，下冊，頁 114）；趙定、陳逖則說，中日戰爭結束前後，蘇中一師文工團演出大型古裝話劇《甲申記》，是根據〈甲申〉改寫的，但亦未云作者是誰（〈戰爭年代蘇北地區的話劇活動史話〉，頁 168）。

則有馬少波的「改良京劇」《闖王進京》、[134] 擊楫詞人（李一氓）的《九宮山》。[135] 這幾部依據〈甲申〉爲藍本的戲劇在當時究竟產生什麼現實作用，史料有闕，不得而知。[136] 以戲劇藝術形式在一般平民間進行宣傳、鼓動，本即是中共文化工作的傳統與黨組織的政策，[137]〈甲申〉成爲文化藝術創作的泉源，有藉戲劇形式影響及於民間大眾的可能性，與這等態勢正相一致。這樣，郭沫若本人不但扮演歷史劇創作者的角色，同時也是其他創作者的靈感來源。但是，這些創作，終究歸結於有利於中共文化宣傳的範疇，是爲現實政治目標服務的工具，具有深刻的政治用途意義。

總結來看，〈甲申〉在 1940 年代中期激起了現實迴響，批判、唱和的論述，在國共之間的文化鬥爭場中衝撞、激盪，截然對立，它更被轉化爲具有政治用途、形塑意識形態的工具。現實政治環境的轉變，也使得歷史的政治

134 羅竹風，〈蜜是甜的，藥是苦的——寫在《從征拾零》前頭〉，收入：氏著，《雜家和編輯》（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頁 222-224；關於《闖王進京》的演出情況，參見：江風，〈膠東解放區文藝整風前後文學創作、文藝理論等情況的回顧〉（《中國人民解放軍文藝史料選編》，冊 3，頁 272-273）、史屏（等），〈活躍在亂後的一支文藝輕騎隊——抗大一分校文工團簡史〉（同書，頁 312-313）。

135 郭沫若，〈關於李巖〉，《歷史人物》，頁 119，《全集》歷史編，4:206；陳丕顯回憶，依〈甲申〉爲藍本而改編的戲劇之一，即包括李一氓改寫的劇本《九宮山》（《蘇中解放區十年》，頁 223；但他未云是否爲京劇）；趙定、陳逖則說，中日戰爭結束前夕，淮海文工團曾演出李一氓依〈甲申〉編寫的大型古裝京劇《九宮山》（〈戰爭年代蘇北地區的話劇活動史話〉，頁 168）；《全集》歷史編「編者註」則表明「擊楫詞人」即李一氓（《全集》歷史編，4:119）。

136 相關資料（如曹晉杰、朱步樓、陰署吾，〈《甲申三百年祭》在老解放區的影響〉、江風，〈膠東解放區文藝整風前後文學創作、文藝理論等情況的回顧〉等）述及這些戲劇演出的影響時，都出以泛泛而論的「產生巨大影響」述說，不足爲據；惟趙定、陳逖云，日本投降後，在「當時華中分局及蘇皖邊區政府主辦的報紙上，曾對《李闖王》一劇進行了相當長時間熱烈討論和爭辯，主要討論尊重歷史與藝術加工之間的辯證關係。一時成爲話劇文學學術討論的盛事」（〈戰爭年代蘇北地區的話劇活動史話〉，頁 168）；筆者未能見到這方面的文獻，但其「討論和爭辯」的主題既是「尊重歷史與藝術加工之間的辯證關係」，恐亦非對這部戲劇之現實作用的討論。

137 當然，這樣的情勢更是所謂「左翼戲劇運動」長久發展脈絡下的產物，其變化轉折，也與後來毛澤東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有關，涵括的課題也相當複雜（如「秧歌」的問世、對京戲等「舊劇」的「改良」等），不能也不必在此做詳細的探討。

效用，被強化地凸顯出來。像明季史事亦是翦伯贊戰時治史重點之一，他早有〈遼瀋淪陷以後的明王朝〉等著述，解釋明室與南明之亡的原因，並批判明廷的做爲；[138] 陳家康之〈明末農民運動研究〉則論述「明末農民運動」由崇禎時期「以反抗社會制度爲主」到南明時期「以反抗外族侵略爲主」的過程，肯定明末流寇的歷史地位。[139] 然而，這些文章刊佈後並未引起像〈甲申〉一樣的「迴響」，可以想見，後來與〈甲申〉相關的述論明季歷史的文章，是因爲如中共「反中國的法西斯」觀點的出現等現實政治脈絡的轉變，而被強化地凸顯出它們的政治效用。這是〈甲申〉有深刻影響的重要因素。它在1990 年代時竟仍可以被中共領導當局詮解爲具有深刻「歷史教訓」意義的文本，[140] 即是這種性格的再度呈顯。

六、結論：評價與反思

在以上的篇幅中，筆者疏理了〈甲申〉問世時的政治脈絡、郭沫若個人寫作此文的心路歷程，也說明了〈甲申〉的現實政治作用。若從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發展的學術史脈絡，前此思想淵源如何隨時空環境變易再度問世等面向，再進行多元的思考，當能更有助於我們對〈甲申〉的評估和理解。

（一）學術史業績層面的考查

從 1949 年前的純粹學術史／史學史既有業績的脈絡中評估，[141] 〈甲申〉的學術價值與地位值得深思。郭沫若的《中國古代社會研究》堪稱中國馬克

---

138 參見本文註 60。

139 參見本文註 83。

140 如江澤民的評譽（參見本文註 2）。

141 筆者所謂的純粹學術史／史學史脈絡，意指不考慮外在（緣）環境，而就某一思想類型（論題）或論著對學術史／史學史的內部邏輯發展的作用評估其地位；這樣的思考觀點源自余英時探討清代思想史的「內在理路說」（參見：余英時，〈從宋明儒學的發展論清代思想史——宋明儒學中智識主義的傳統〉、〈清代思想史的一個新解釋〉，均收入：氏著，《歷史與思想》[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1976]）的啓發；然是否恰當，自必待學界先進批駁教正。

思主義史學的開山之作，[142] 他考述卜辭（甲骨文）、金文的成就，[143] 都足可領袖群倫；但是，對比於當時既有的明季史事論著成果，〈甲申〉在探討明季史事的作品中卻難能居首席之地。

歷史解釋方面，〈甲申〉頗有疏漏。如吳晗、趙宗復與李文治都曾論述驛卒、逃兵爲明末流寇的社會成份之一，[144] 但〈甲申〉並未析論及此。然而，其他史家論述明末驛卒與亂之事，引據的資料都是郭沫若寫作〈甲申〉引用過的，[145] 他卻未注意其中涵括這一論點的材料。可見郭沫若對當時所能掌握的史料涉及之各面相的內容與意義，未能深入探究，即匆促立論。又如李自成的下落問題，郭沫若僅述其於順治 2 年 9 月「犧牲於湖北通城之九宮山，死時年僅三十九歲」；[146] 其餘學者則意見不一，像童書業論證李自成於順治 2 年 5 或 6 月敗竄湖北通山縣之九宮山，「爲村民所困，死焉」（李文治亦採取童書業之論點）；趙宗復主張李自成後爲僧；王崇武則以爲李自成於順治 2 年（南明隆武元年；但未言月份），死於湖北九宮山「最近情理」。[147] 整體

[142] 參見：潘光哲，《郭沫若與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起源：以《中國古代社會研究》爲中心的討論》（台北：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1 年 6 月）。

[143] 參見：吳浩坤、潘悠，《中國甲骨學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頁 313-318、彭靜中，〈中國甲骨學研究的里程碑──學習郭老的《卜辭通纂》等等甲骨學著作〉，樂山師專郭沫若研究室（編），《郭沫若研究論叢》（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1988），頁 178-213、王世民，〈科學的方法，完整的體系──略談郭沫若的金文研究成就〉，《郭沫若研究》「學術座談會專輯」（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1984），頁 238-243。

[144] 分見：吳晗，〈明末流寇之社會背景〉，頁 483-485；趙宗復，〈李自成叛亂史略〉，頁 134-135；李文治，《晚明民變》，頁 17-20、25-26。

[145] 如吳晗引《明史》〈流寇傳〉（〈明末流寇之社會背景〉，頁 484），李文治引《明季北略》（《晚明民變》，頁 26），《明史》〈流寇傳〉與《明季北略》都是〈甲申〉引用過的（參見本文註 78）。

[146] 後來郭沫若亦同意李係死於通山（〈關於李自成死難地點的問題〉，《全集》歷史編，3:454），故《全集》版亦改爲通山（《全集》歷史編，4:203）。

[147] 分見：童書業，〈李自成死事考異〉，《史學集刊》，期 3[北平：國立北平研究院，1937 年 4 月]；李文治，《晚明民變》，頁 157-159；趙宗復，〈李自成叛亂史略〉，頁 151-153；王崇武，〈董文驥與明史紀事本末〉，《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 20 本上冊（南京：1948），頁 266-272。

來說，這些論著的論點未必皆爲不移之論，然而彼等依據詳瞻史料以考史、釋史，實爲〈甲申〉所不及。

史料搜集方面，其他史家搜求明季（與南明）史料以考史撰史，互有勝長，郭沫若則頗有不及之處。如郭沫若與趙宗復都徵引馬懋才的〈備陳大飢疏〉，但趙宗復則指出《明季北略》、《延安府志》俱載此疏而各有刪節，故依據此二書拼補全文；[148] 其他史家更就李自成、李巖等人事蹟、活動地域所及，徵引各種方志，[149] 皆可見彼等探訪文獻，搜求史料之功力。就史料徵引言，只引據 7 種資料的〈甲申〉，自然是瞠乎其後。

是以，與那些廣參文獻，在詳瞻史料基礎上排比、考訂材料敘述之同異、探求史實之真相的嚴謹史著相較，〈甲申〉不過只是文人稍涉史籍後馳騁想像力的筆墨游戲。

〈甲申〉在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史的地位，同樣也要審慎的評估。郭沫若在文中對「農民起義」的肯定、對李自成、李巖的稱揚，和傳統史學或當時某些非馬克思主義史家之否定、抹殺「農民起義」的論述，[150] 當然大異其趣。但就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發展脈絡來看，將〈甲申〉的論述與當時馬克思主義論者對此一課題的既有觀點、以及此後中國大陸史學界對「農民戰爭史」新一波的爭論課題對比，郭的總結與稱頌都是貧乏的。

與當時馬克思主義論者的既有觀點對比，〈甲申〉也並沒有突破性觀點的論述。如毛澤東對「農民起義」、「農民戰爭」之歷史作用的肯定與讚揚：[151]

---

[148] 趙宗復，〈李自成叛亂史略〉，頁 133-134、頁 135「註四」。

[149] 如趙宗復引用《開封府志》（〈李自成叛亂史略〉，頁 139）、童書業徵引《通山縣志》（〈李自成死事考異〉，頁 264），不詳舉。

[150] 但也有史家持正面觀點，如 1930 年代中期的吳晗即肯定李自成的歷史地位（參見本文註 83）；而且，當時對中國歷代「農民起義」，也並不是全都持否定觀點，如對太平天國的觀點即歷經變化，否定、贊譽兼而有之，如孫中山等革命黨人頗致贊揚，但以蔣介石爲領袖的國民政府則否定之，反而稱頌曾國藩、胡林翼等人(Harrison, *The Communists*, pp. 80-85)。所以對「農民起義」評價觀點，也有其變化過程，具有反映各階段中國政治局勢的意義，不該等同而視。

[151] 毛澤東，〈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1939)〉，收入：《毛澤東選集》，卷 2（重排直排本），頁 619；毛類似的論述很多，如在致李鼎銘的信說中國「自秦以來二千餘年推動社會向前進步者主要的是農民戰爭」（毛澤東，〈致李鼎銘（1944 年 4 月 29 日）〉，

> 在中國封建社會裡，只有農民的這種階級鬥爭、農民的起義和農民的戰爭，才是歷史發展的真正動力。因爲每一次較大的農民起義和農民戰爭的結果，都打擊了當時的封建統治，因而也就多少推動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

毛的論述是此後研究「農民戰爭史」的「經典」依據之一，[152] 在 1949 年前更已有論者引申他的觀點來檢討明季流寇（乃至「農民戰爭史」）的歷史意義。[153] 然則，郭沫若基本上是從歷代開國功臣多慘遭屠戮下場的例證脈絡，提出李自成「代表的農民利益的運動早遲也會變質」的議論。同既存的觀點比較，〈甲申〉的論述並不像毛那樣能夠結合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論式之一：「社會生產力」的觀點來評估「農民戰爭史」之歷史意義；[154] 他也不曾聯繫

《毛澤東書信選集》，頁 230-231），不詳舉。此外，毛對「農民起義」、「農民戰爭」之結果也有獨特的總結（參見：〈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頁 619-620），不詳引。

152 逯耀東，《中共史學的發展與演變》，頁 59；張哲郎曾統計刊於《歷史研究》的 74 篇「農民戰爭史」文章，引用各種馬克思主義人物與「經典」的情況與次數，毛亦居其列（張哲郎，〈大陸學者對於「農民戰爭」問題的研究與詮釋──以《歷史研究》雜誌爲中心〉，《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期 13[台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系， 1996 年 4 月]，頁 35），但他未明確指出這些文章引用了毛的那些論著。

153 如陳家康指稱「中國社會自從進入以封建制度爲主要生產方法的歷史階段以後，農民運動就成爲重要的社會動力」（陳家康，〈明末農民運動研究〉[參見本文註 83]）；又如蒲韌之論說：「從農民戰爭中得到好處的還是地主統治者」、「沒有農民戰爭，我們就難以想像封建社會何以能在這長期中一步步不斷前進」（蒲韌，《二千年間》[上海：開明書店， 1949]，頁 95-117）。

154 當然，毛對「農民的這種階級鬥爭」之論述，同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傳統爲適應現實革命需要而有所改變的情勢，有相當的關聯（參見： Harrison, *The Communists*, pp. 38-61）；亦且，這不是中國的孤立現象，如一次世界大戰前的德國社民黨(SPD)、或帝俄時代的馬克思主義者（及蘇共），對德、俄之勞工階級、農民階級的觀點、政策與策略（如農民階級可否如資本主義生產關係中的勞工階級一樣，成爲馬克思主義意義下的革命「動力」[the agent]、該如何與農民階級「合作」等課題），都有熾熱的討論與爭辯，是馬克思主義理論傳統（與實踐）之變化的一大主題（相關討論，參見： D. Mitrany, *Marx Against Peasant: A Study in Social Dogmatism* [N. Y.: Collier Books, 1961 〔1951〕]、 A. Hussain & K. Tribe, *Marxism and the Agrarian Questions* [London: The MacMillan Press, Ltd., 1983 〔2nd. edition〕]）；至於毛的觀點同其他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的觀點有何差別？在這個理論變化過程中有何意義？都是可以探討的問題，不詳論。

毛的觀點有所發揮。[155] 因此，他雖然揚言以「人民思想」爲評價歷史人物的標尺，[156] 但是，這種標舉觀點，不過是當時一般馬克思主義史家的「共識」，[157] 並不特殊。在此後中國大陸史學界「農民戰爭史」的龐大研究成果中，[158] 對於「農民政權」性質的討論是焦點之一，探討這個課題的「理論深度」，[159] 〈甲申〉實更遠遠不及。[160] 郭沫若此一論述的基調，和「農民戰

[155] 當然，1949 年前的郭沫若對「農民戰爭史」之歷史意義，也曾略做思惟，如他訪問蘇聯時做過〈戰時中國歷史研究〉的報告（1945 年 8 月 3 日[《年譜》，中冊，頁 621]），便將之與「中國封建社會的長期延續問題」連繫而論（郭沫若，〈戰時中國歷史研究〉，《佚文集》，下冊，頁 106-107），但他在〈甲申〉（與同一時期的相關文章）中並沒有這樣的看法；要到 1959 年發表〈替曹操翻案〉（原刊：《人民日報》[1959 年 3 月 23 日]，收入：氏著，《文史論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頁 176-192，《全集》歷史編，3:457-476）、〈中國農民起義的歷史發展過程——序《蔡文姬》〉（原刊：《人民日報》[1959 年 5 月 16 日]，收入：《文史論集》，頁 193-199，《全集》文學編，8:3-12）等文後，才對「農民起義」、「農民戰爭史」之歷史意義與理論問題發表意見。

[156] 如他從李巖之「均田」論爲起點，對「人民思想」爲評價人物之標尺的論議，並說當時「還沒有十分普遍而澈底地展開」「帝王思想與人民思想的鬥爭」（郭沫若，〈[歷史人物]序〉，頁 4，《全集》歷史編，4:5）。

[157] 馬克思主義史家批判傳統史家（史著）只論述帝王將相，不述說人民大眾之歷史、或對以「統治階級」觀點臧否史事（人物）的批評，頗爲繁多，如范文瀾爲主要撰稿者的《中國通史簡編》，雖是幫助中共幹部補習文化之用爲寫作目標，但其內涵確如其自述「肯定歷史的主人是勞動人民，把舊型類[類型？]歷史以帝王將相爲主人的觀點否定了」（范文瀾，〈關於中國歷史上的一些問題〉，收入：《范文瀾歷史論文選集》[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79]，頁 17、22）；而如呂振羽雖聲言不該否定「偉大人物對歷史的作用」，但也表示「歷史不應是帝王家譜，偉大人物的起居注」（呂振羽，〈中國歷史研究提綱〉，收入：《中國歷史論集》[廈門：東方出版社，1945]，頁 152）；類似的論述很多，不必詳舉。當然，20 世紀初的梁啓超之〈新史學〉即有類似的觀點，但他的論述和馬克思主義史家之批判，不論是理論依據或其關懷所在，均有相當的出入，不應混爲一談。

[158] 據粗略統計，自 1949 年到 1966 年「文革」前中國大陸史學界關於「農民戰爭史」研究文章總數約達 3,000 篇、論著（含資料集與通俗小冊子）在百種以上（陳梧桐，〈農民戰爭的種種爭論〉，收入：《歷史研究》編輯部[編]，《建國以來史學理論問題討論舉要》[濟南：齊魯書社，1983]，頁 204）。

[159] 中國大陸史學界對「農民政權」的爭論，主要是：農民是否可能建立起政權？農民政權的性質是什麼？「流寇主義」是否爲農民起義失敗的原因？等等（參見：吳安家，〈中共對中國歷史上農民起義的政治解釋〉，《中共史學批判論集》，頁 90-96、佐藤文俊，《明末農民反亂の研究》，頁 272-306[尤其是頁 278-285]、Harrison, *The Communists*, pp.

爭史」的爭論課題雖然有一定程度的關聯，表明了「農民戰爭」結果的某種「規律」，[161] 然則，他對「農民戰爭史」歷史意義的總結，並不是深刻而具突破性的論述。因此，過於高估〈甲申〉在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史的學術座標地位，[162] 不免如同只以放大鏡觀察單一事物而未考察整體態勢的可能結果。

此外，郭沫若的「史論」評價，也還預示了此後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某種「獨特」面向。郭沫若依據有限的史料，對李巖這個真實性還有商榷餘地的人物大發議論，抒張個人的感懷；文學家的感性情緒更益發高漲，日後評價李巖的調子，竟越來越高，都使得他的評述呈現出「以論帶史」（乃至是「以論代史」）的傾向。這也正是 1949 年後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發展最為人詬病的現象之一，如翦伯贊對「以論帶史」就有嚴厲的批評，斥之為「帶有很大的片面性，是一種不正確的提法」。[163]〈甲申〉雖然不像有這些傾向

134-139）。

160 郭沫若曾對李巖「均田」之主張，頗致好評（參見本文註 86），然皆未述及其意義；後來他則視為「反映了農民的平均主義」的一個例證（〈中國農民起義的歷史發展過程〉，《文史論集》，頁 195，《全集》文學編，8:6），但這是 1949 年後的觀點，不能代表他在寫作〈甲申〉時的認識。

161 即與劉邦、朱元璋一樣是農民出身的李自成，在「成功」以後也會屠戮功臣，這是日後討論「農民政權」轉化為「封建政權」的例證之一；當然，也有些馬克思主義史家從別的角度來釋論這一現象（如歷經「思想改造」的吳晗在宣稱以「馬克思主義理論」進行改寫的《朱元璋傳》中，即用「統治階級的內部矛盾」觀點來闡論朱元璋屠戮功臣的意義[參見：潘光哲，〈學習成為馬克思主義史學家：吳晗的個案研究〉]）。

162 就筆者閱見所及，在 1949 年前能有別於毛澤東之詮釋，對「農民戰爭史」的歷史「規律」與意義提出獨創性論點的馬克思主義史學家，當推翦伯贊，如他對中國農民起義是「封建社會經濟內部矛盾對立的轉化過程」的結果等問題，曾提出系統化的說明（翦伯贊，〈略論中國史研究〉，氏著，《中國史論集》，頁 11-15）；日後他以「歷史主義」觀點省思「農民戰爭史」的歷史「規律」與意義時，更有賡續而深入的發揮（王學典，《二十世紀後半期中國史學主潮》[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1996]，雖未考查其前後觀點的內在邏輯理路，但於翦伯贊之「歷史主義」觀點與相關論述之探討極為精湛）；然筆者未得全面查閱文獻，此處觀點，應待查證，亦必待學界先進批駁教正。

163 翦伯贊，〈史與論〉，收入：氏著，《翦伯贊歷史論文選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頁 79；翦伯贊並倡議以「歷史主義」觀點避免此種缺陷；相關評述，參見：許冠三，《新史學九十年，1900-》，下冊（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88），頁 133-144；此

的論著一樣，是剪貼「經典」與「史料」的成果，[164] 但是， 1940 年代的郭沫若，對李巖的論述即已透露這樣的端倪。[165]

所以，〈甲申〉在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史上得居一席之地，並不是它對此後馬克思主義史學提供學術的「典範」價值，[166] 而是由於它的政治現實作用。這些態勢，都顯示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傳統的重要內涵之一，是這種與現實相呼應、爲現實環境服務的性格。[167] 這樣的情勢，更提醒後繼的研究者，探析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時，如果能就類似〈甲申〉這樣的爭議性課題做更多的個例探討，確切疏理研討主題和時代互動的關聯與情勢，注意這些爭議課題與個人的學術背景、研究意趣的趨向，[168] 並聯繫論者個人的生命軌跡等

外，亦有學者從政治角度詮釋翦伯贊的「歷史主義」觀點（如 C. Edmunds 認爲，這是在毛主義的黨國體制[party-state]下，企圖進行相對有限的學術自主性的體制化工作之觀點[C. Edmunds, "The Politics of Historiography: Jian Bozan's Historicism," in: M. Goldman, T. Cheek & C. Lee Hamrin, eds., *Chinese Intellectual and the State: In Search of a New Relationship*〔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pp. 65-106]）。

164 即如逯耀東所述，當時不少史著都是先引用馬克思主義「經典」依據，再引用中國歷史資料，或先引用中國歷史資料，再引用馬克思主義「經典」爲結論（逯耀東，《中共史學的發展與演變》，頁 9-10 、 61-62 ）。

165 當然，這並不是說郭沫若對李巖的論述要爲「以論帶史」（乃至「以論代史」）這種現象的出現「負責」，畢竟，「以論帶史」（乃至「以論代史」）現象的問世，也歷經相當複雜的過程，必需另行處理；筆者在此只強調郭沫若的論述中預示了這樣的傾向。

166 郭沫若的《中國古代社會研究》即是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學術「典範」之作，蓋「祖述馬恩」，佐以對中國古典文獻、考古資料之釋證，提出論斷，是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家的共同特徵，而此書首開先端。〈甲申〉的「貢獻」絕難與此書比擬。

167 如 A. Dirlik 論述做爲史學理論的馬克思主義，如何因應革命之需要終至陷入意識形態泥淖的「中國經驗」(A. Dirlik, *Revolution and History: Origins of Marxist Historiography in China, 1919-1937* [Berkeley & L. A.,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8])；郭沫若本人自 1920 年代末期起即倡言運用馬克思主義研究中國思想、社會的發展，他的《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亦可視爲另外一種表達政治意見的方式，全書的論證，更起了巧妙的譬喻作用——由清算過往的社會，看出對於未來社會的期望，與現實相呼應的意味相當強烈（潘光哲，〈郭沫若治古史的現實意涵〉，《二十一世紀》，期 29[香港：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1995 年 6 月]，頁 84-90 ）；爲現實需要而述史立說、或述史立說可爲現實服務之用，實可謂是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傳統的重要內涵之一（當然也引生不少的問題，暫不論）。

168 如本文就郭沫若的歷史劇創作興趣來解釋〈甲申〉的問世；又如，研治傳統中國經學出身的范文瀾、以研究並翻譯馬克思《資本論》爲起點的侯外廬，兩者對中國古代史的看

等脈絡，[169] 那麼，我們對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發展歷程，當可有更細緻的認識與理解。

（二）歷史論述與意識形態

再從深遠的整體歷史脈絡來看，選擇明末史事為主題開展歷史論述，「述古議今」，產生現實政治作用的行動，乃是過往類似行動的復活，有著深厚的思想淵源。我們可以視之為清末研討明季（與南明）史事、大量刊佈這個時期的史著等行動的延續。

清末那些在反滿革命風潮下出現的行動，企圖產生的效用，當然有濃厚的政治／民（種）族意義。[170] 不過，像〈甲申〉這些述論明末史事的文章，固然一樣也有企望產生政治效果的用心，但是，外在環境的差別，它們的政治意義卻有相當程度的變易。〈甲申〉這些述論明末史事的文章，雖然因為戰爭關係而多少帶有警惕避免「亡國之恨」的意味，但是，字裡行間卻更是對國民政府（及其領導階層）的做為進行歷史的對比，嘲諷意味濃厚，企圖達成的政治目標是幫助與現實政治體制敵對的另一個政治勢力取得文化優勢，較不具前此的民（種）族意義。而如〈甲申〉等文，更可能是組織化行動的成果（甚至可以說是在現代意義的「黨」的指揮、推動下，進行「革命」的文化鬥爭行動），與身受反滿革命風潮感染的前行者的個人行動，有巨大的差異。[171] 因此，雖然有著一脈相承的思想淵源，但隨時空環境的變遷，類

法絕不一致，亦是一例。此題需另行探討，不詳論。

169 郭沫若致力甚勤的屈原研究即為一例。對屈原的探討，本即為中國現代學術史之一章，而侯外廬對屈原的看法和郭沫若並不一致，引生爭論，意見爭鋒所涉，非僅為對屈原及其思想之理解、認識的差異，亦為雙方對中國古代社會史（與分期問題）之不同立場的呈顯。對屈原的「藝術化」則又是郭沫若的興趣之一，也有政治意義。值得總結相關歷史脈絡，進行探討。

170 參見：謝國楨，〈自序〉，頁 10B，氏著，《晚明史籍考》（北平：國立北平圖書館，1932）、王汎森，〈清末的歷史記憶與家國建構——以章太炎為例〉，《思與言》，卷 34 期 3（1996 年 9 月），頁 15-17。

171 如國學保存會雖曾募股成立「國光社印刷所」，承司該會書籍報章之職（蕭瓊瑤，《清末民初國粹思想研究》[新竹：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1]，頁 79），但他們「隸屬」的「黨」在這一方面不起作用；當時能稱為受「黨」的指揮、推動，以組織

似行動的延續意義與現實作用卻另呈風貌。[172]

整體而論，與〈甲申〉同調之論述的問世，確實有現實鬥爭的意義，它們被意會爲「借古諷今」的作品，遭逢「回味甲申，暗示新的亡國的危機」[173] 之批判；〈甲申〉被轉化爲具有政治用途、形塑意識形態的工具，也顯示歷史論述如何爲中共革命（政權）意識形態霸權(hegemony)服務的意義。[174] 不過，以〈甲申〉爲例，即可發現，歷史論述固然被轉化成爲現實政治意識形態霸權服務的工具；但是，這種政治用途的產生，未必是史家撰寫歷史論述時的「設定」，反而可能是既成政治體制（或其首腦）意志的產物。即如本文所述，黨領袖對於〈甲申〉的解讀及其「體會」，實際上並不是它的主要論旨。可以生產意識形態霸權的機器，並不受歷史家的掌握，反倒操控在既成政治體制（與其首腦）的手上，所以與〈甲申〉同調的其他文章，未曾得到「黨」的「青睞」，就比較難產生像它一樣的影響力。[175] 這樣的例證，也提醒後世史家在探討歷史論述的政治用途，解析歷史論述如何爲意識形態霸權服務的時候，不僅該分析歷史論述的內容，注意前此的思想淵源，也該注意既存政治勢力對它的「反應」，又從什麼樣的角度「設定」它的政治用途。例如，馬克思主義成爲共產主義國家官方意識形態後，所謂馬克思主義（與馬克思主義的歷史解釋），往往以共產黨領導者之解釋（或歷史論述）爲綱領，但卻常因現實政治領導階層（勢力）的變易而使之不再被奉爲

化方式進行「革命」的文化鬥爭行動，應是同盟會發刊《民報》後和《新民叢報》的論戰（參見：亓冰峰，《清末革命與君憲論爭》[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1966]，頁 158-165 ；當然，在章太炎主持《民報》編政後，態勢亦有改變，不詳論）。

172 王汎森教授點撥筆者對兩者關聯性之思考，甚得教益，謹致謝忱。

173 〈前言〉，頁 4-5 ，葉青（等），《關於〈甲申三百年祭〉及其他》。

174 探討「古爲今用」這個課題即是一例， J. Unger ed., *Using the Past to Serve the Present: Historiography and Politics in Contemporary China* (New York: M. E. Sharpe, 1993)一書收錄的 9 篇論文大體足爲代表。整體來看，諸文論旨是藉各主題的探討以呈顯出中共政權如何藉歷史各式論述及詮釋（如戲劇形式、口號）來形塑（並鞏固）意識形態霸權。

175 吳晗的《海瑞罷官》的政治結果，或許也可以從這個角度來理解。此題需另行探討，不詳論。

（歷史）解釋（與評價）的「經典論述」，[176] 因此，不能只分析歷史論述的內容，還該注意它被轉化爲具有政治用途之工具的情況。後繼的研究者，在解析歷史論述與意識形態的關聯時，顯然需要投注更寬闊的視野。

中日戰爭階段，國共之間明鬥暗爭，「動作」頻頻，硝煙時起，〈甲申〉的問世及其相關紛擾正是其中的一幕。〈甲申〉這樣的歷史論述與政治現實有著緊密的互動關聯，但是，政治領袖卻巧妙地擷取歷史論述的部分論點，加以轉化，產生了讓撰述這分歷史論述的史家料想不到的現實作用。以〈甲申〉爲例，顯示歷史論述與政治現實的互動關聯相當複雜，有待後世的歷史工作者細心疏理的問題空間，亦是無限寬廣。

[176] 參見：潘光哲，〈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研究成果的省思與回顧〉。